



2012年1月31日创刊      2015年11月30日第60期

## 本期目录

### 造反派研究

董国强 关于文革期间“造反派”概念的几点思考

陈益南 对“造反派”含义的几点思考

张光渝 定义“造反派”

周伦佐 略谈“造反派”定义

### 忆旧思亲

徐小青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探寻父亲悲剧之源

### 书海泛舟

何 蜀 写出自己的真历史与真思考——罗成胜回忆录序

罗成胜 疯狂的报复（《我的造反生涯》选读）

### 编读往来

张光渝谈 59 期两文

李正权谈 59 期张光渝文

辛巴德谈华国锋是否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黄顺义征集三位武斗死难同学照片

---

### 【造反派研究】

## 关于文革期间“造反派”概念的几点思考

董国强

在研究和论述文化大革命的时候，“造反派”无疑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核心概念。如何理解这个概念，牵涉到对文革的整体认知。我认为“造反派”概念应该有以下几个重要限定：

## 1. 时间限定

“造反派”是文革初期特定历史语境的产物，特指在 1966 年下半年至 1967 年初响应最高当局的号召，向各级党委发起冲击并在 1967 年初实施“夺权”的群众组织成员。这类群众组织在 1968 年“大联合”高潮中逐步失去合法性，被得到官方认可的“红代会”、“工代会”等新型群众组织取代，“造反派”的概念也随着其组织的解散而寿终正寝。至于少数在“大联合”期间作为“群众代表”被结合进各级革委会的原造反派头头，其个人身份在结合之时已经由“造反派”转化为“新干部”。他们在 1974 年“批林批孔”运动和 1976 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与军队干部群体和地方老干部群体之间的复杂纠葛，已经与群众性造反运动无涉，而是体制内部的斗争。而在 1970 年代前、中期涌现出来的一些“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代表人物，如张铁生、黄帅等人，则被冠以“反潮流战士”之类新头衔。“反潮流”带有挑战权威的意味，但是“反潮流”仅限于反对具体的文化教育、企业管理等方面的所谓“黑线回潮”，而不是挑战和颠覆整个官僚体制。因而他们不应视为“造反派”。官方舆论在宣传这类人物时也不再使用“造反有理”的口号而代之以“反潮流”、“对着干”一类新提法，同时一再强调要“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搞运动”，也是这个道理。

## 2. 社会身份限定

“造反派”（群众组织成员）是与“当权派”（中高级党政领导干部）相对应的概念，其社会构成一般包括学生、工人、农民、其他社会底层民众和一部分中下层机关干部。由于各级党政机关中处长以上干部在运动初期都被认定为“当权派”，所以所谓“机关干部造反派”成员一般都是副处长以下的干部和一般机关工作人员。公开支持群众性“造反”、“夺权”活动的一部分中高级党政干部，当时被称为“革命干部”，不能算作“造反派”。

## 3. 政治倾向限定

“造反派”是与“保守派”相对应的概念。“保守派”群众组织在社会构成上与“造反派”没有太大差异，但这类组织一般是在各级党委的怂恿和支持下成立起来的，所以他们积极拥护、竭力捍卫各级党委。在 1967 年“一月风暴”期间，保守派组织随着地方党委的垮台而土崩瓦解，大部分一般成员纷纷加入“造反派”。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其实“造反派”和“保守派”的政治分歧，不在于要不要坚持党的领导，而在于谁是党内正确路线的代表。“造反派”的言行可以被归纳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也可以被归纳为“奉旨造反”。从这个意义上讲，“造反派”依然是中共政治体制的“保守派”。至于那些真正从内心敌视中共政权，希望颠覆中共政权的势力，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造反派”，而是“现

行反革命”。

#### 4. 军地差异

军队内部的司（司令部）、政（政治部）、后（后勤部）机关及其下属单位（如军事院校、军队医院、军内文体单位等），在 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也曾开展文革运动，因而也出现过一些“造反派”。这些人一般军阶不高，多为营连排级干事、参谋等机关工作人员和部队院校、文艺团体成员。由于“造反”运动并没有在全军范围内广泛开展起来，所以军内“造反派”的势力和影响相对弱小（个别军事院校在当地影响较大），很快就因军内“当权派”的严厉镇压而土崩瓦解。而且由于军地分治的制度安排和军队纪律的约束，军内“造反派”与地方群众组织之间联系相对较少（各地军事院校中的派性斗争与地方派性的联系较为广泛）。至于 1967 年以后各地“支左”部队与地方群众组织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与一般意义上的“保守派”、“造反派”概念无涉。地方派性冲突的发展和军队内部的分裂，是中央政策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结果。导致军队内部分裂和对抗的因素，不是要不要贯彻执行中央的指示，而是应该贯彻执行中央的哪一个指示。

长期以来，一些关于文革的历史叙事常常会滥用“造反派”这个概念。我认为导致混淆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

##### 1. 群众组织的自我宣传与攻击性宣传

在 1966-1968 年期间，群众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各派为了争取政治合法性，都迎合当时的主流舆论宣传自命为“造反派”，同时指责对方是“保守派”。事实上，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组织已经普遍在 1966 年底至 1967 年初（个别地方要晚些）土崩瓦解，此后相互对立的派别大多是原来意义上的“造反派”阵营中的两翼。

##### 2. “支左”部队的态度

军队介入“支左”以后，很快被卷入地方派性斗争。军管当局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治合法性和政治权威，在地方两派中支一派、打一派，通常也会顺应当时的主流舆论宣传，将自己支持的一派定性为“造反派”，将自己打压的一派定性为“保守派”。因而，此类政治标签仅仅是政治权宜之计的产物，而非当时两派群众组织政治倾向的实际情况。

##### 3. 领导干部的笼统认定

很多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在文革期间被长期“关牛棚”，对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毫无概念。后来受“后文革”时期主流话语的影响，他们常常会将迫害他们的人都看做“造反派”。实际上从 1966 年到 1976 年，对各级领导干部实施审查、管制和迫害的势力各不相同：文革刚开始时是各级党委和工作组，1966 底至 1967

主要是“造反派”（部队介入“支左”后则增加了各地“支左领导小组”和军管会之类权力机构），1968年“大联合”以后则是军宣队、工宣队、革委会控制下的专案组。尽管不同时期的专案组中包含一些原群众组织成员（其中既有原来的“造反派”，也有原来的“保守派”），但他们此时都是得到新秩序认可并积极为新秩序效力的社会力量。

#### 4. 群众组织在本单位和在社会上不同政治倾向的复杂性

由于文革理念本身的含混性，以及运动期间政治格局和政治关系的错综复杂，各群众组织的斗争矛头有时对准单位领导，有时对准地方党政领导。因此，有些群众组织在本单位是“保守派”，但是在反对省、市委的斗争中又是“造反派”。这种情况在一些实行中央和地方双重领导的企事业单位显得尤其突出。例如南京长江机器厂的群众组织“长江红旗”，在1966年底一方面竭力捍卫长江厂党委，另一方面积极加入反对南京市委的斗争。其对立组织“红色职工战斗委员会”的政治立场则截然相反。由此可见，关于“造反派”概念的考量，不仅涉及“造反”行为，而且涉及“造反”对象。政治结构的复杂性，衍生了“造反派”概念的多维性和歧义性。

---

#### 【造反派研究】

### 对“造反派”含义的几点思考

陈益南

#### （一）什么是文革中的造反派？

秦晖为孙怒涛主编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所写的序中说：“笔者认为从群众性‘造反’体现出对‘17年’官僚体制不满这一点看，定义‘造反派’应该主要看社会学特征和意识形态背景，而不是看对某个具体当权者的态度。对17年体制（有时未必是对整个体制，而是对自己在体制下的具体生存状态，比如受工作队的压制等）不满，但又接受当时官方意识形态、并以此为‘造反’理由的，就是‘造反派’。——如果对体制不满而且反对当时的意识形态，那在当时就算是货真价实的‘反革命’，而不是‘造反派’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5年版，31页）

参照这一说法，笔者认为：在文化大革命中，那些对17年来体制的某些方面不满、尤其在文革初，或曾亲身被这个体制的地方官僚所压迫伤害，或者对地方官僚压迫伤害无辜民众的恶行极感不平，故而借毛泽东号召“整党内走资本主

义道路的当权派”之机会，自发而奋起反抗与批判斗争地方官僚，但却又依然接受当时官方政治意识形态的人们，就是造反派。

## （二）造反派崛起的根本原因

文革中，毛泽东对“造反有理”的一系列“最高指示”，是造反派得以产生、活动的客观条件，是造反派得以产生、活动的一个历史性机会。

但，这个机会，绝不是造反派崛起的根本原因。

一个专制集权、不能给以民众应有的政治自由的制度，才是随时可能产生种种造反力量的必然土壤。

在民主国家，一个轮替上台执政的政党，只要开始执政，就会不可避免地会犯大小错误，会积累民众的种种不满。一个连续集权执政了 17 年的官僚体制，无疑，更是积累了民众的巨大不满与怨愤。

在民主制度下，民众可以用几年一次的选票，发泄他们对执政者积蓄的不满，并更换执政者。

在专制制度中，民众只有“造反”一途，才有机会发泄他们的不满与怨愤。

## （三）造反派是否都是“奉旨造反”？

虽然，是毛泽东给了民众可做造反派的机会；虽然，造反派仍然是以当时官方的政治意识形态为思想武器，但造反派却并非全是对圣意的拥戴与执行，他们造反的动力实际上多是维护自身生存的需要，或对地方官僚胡作非为的义愤所致。

将造反派的行为，纯解读为“奉旨”，应该是对文革历史的认识，尚停留在资料的层面，而基本缺乏感性了解之故。

任何能激发广大民众响应、跟随、认可的政令，如果不具有民众响应、跟随、认可的社会条件，都是难以演变成积极的群体性运动的。所以，造反派的崛起，不是“奉旨”的结果，而是民众“借旨”的创造。

## （四）文革造反派的两个主要特征

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句比喻，简要形容文革造反派的性质，似是比较恰当。因为，文革造反派具有两个主要特征：

### （1）反抗与批判地方官僚集团；

## （2）依然接受当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

区别文革中造反派与保守派的显著标志，就在于上述特征（1）。

一般来说，不论是用何种方式，打着何种旗号，凡是斗争矛头是对着地方官僚集团及其御用组织的，就是造反派；而将斗争矛头指向民众的，就是保守派。

而造反派与所谓“反革命”即激进的思想先驱者的分水岭，则在于上述特征（2）。

造反派可以批判斗争地方官僚集团，但他们却不能接受反对共产党反对毛泽东的任何观点，不会接受与“阶级斗争”理论不相符的人权与法制理念。

造反派之所以要对地方官僚集团进行“造反”，是因为他们认为那些地方官僚已是压迫民众的阶级异类，已是违背毛泽东指示的坏官。同样，也并不认为培育那些地方官僚的制度，存在什么问题。

造反派的这两个特征，一直存在于整个文革时期。

所以，文革前期的造反活动，曾受到千千万万民众的欢呼与支持，因为，声势浩大的造反活动，为成千成万在文革初期被打成“反革命”与“右派”的民众进行平反、大力批判斗争地方官僚集团的代表（领导干部）、控诉地方官僚集团17年来的过错与罪恶，这一切，无疑使造反派在解救了自身的同时，也赢得了社会大多数人的同情与支持。

但是，由于造反的范围，只局限在当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框架之内，当控诉地方官僚集团的过错与罪恶、批判斗争地方官僚集团的运动，因毛泽东的决定予以停止、并转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后；当批判斗争地方官僚集团的运动，历经数年却注定不能有新的内容突破后，造反派这个“新生力量”，便在民众的期盼中，逐渐失去了原本获得的同情与支持。

造反派的前一个特征，使他们注定了要与整个官僚集团为敌；而第二个特征，则又使他们的造反，注定难以给民众与社会，创造长期的崭新的自由局面。因而，随着文革的结束，再得不到民众鼎力支持的造反派，成为官僚集团疯狂报复镇压的对象，便是必然。

## （五）首倡造反的红卫兵，不是造反派

早期的北京红卫兵（“西纠”及后来的“联动”等“老兵”），“造反有理”的口号喊得最早，“革命造反精神”鼓吹得最响亮，但是，他们绝对不是造反派。

早期红卫兵的“造反”斗争矛头，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即指向一切所谓“黑五类”、“黑七类”，指向被官僚集团抛出作为革命对象的文化领域的名人权威，而并不是指向所谓“走资派”即官僚集团中的领导干部。因而，他们所鼓

吹的造反，与造反派的造反，不是一回事。

首倡造反者，却不是造反派。这确是文革历史中吊诡的一页。

## （六）群众造反运动结束之后出现的一些政治风云人物，不是造反派

比如 1973 年因高考交白卷事件而在政坛上突然走红的张铁生，其实并不是造反派。因为他既不是因反抗地方官僚集团的迫害，也不是因对地方官僚胡作非为行为不满而交白卷，他只是对文革中期那次高考的方式，觉得有失公平，用自己的方式，表达了一次抗议。不幸，他的抗议行为，恰好符合了“四人帮”的某种需要，故立即受到了“四人帮”的青睐而走红，成为了他们在教育战线一个特殊的政治工具，所以，文革结束后，他不可避免会受到整肃。

将张铁生说成造反派，其实是对文革历史认知的欠缺。

## （七）造反派在文革中活跃的时间

造反派在文革中崛起与活动的时间，在文革中的命运，各地情况参差不齐。除上海之外，全国大多数地区的造反派，在十年文革中的遭遇，苦难的岁月远远多于扬眉吐气的日子。

以湖南为例，1966 年 9 月起至 1968 年 4 月成立省革委会为止，是造反活动的第一轮高潮时期，随后便逐步走向低谷，到 1970 年“一打三反”运动开始，造反派便已几乎全部被整肃，重新沦落到“反革命”的地位。所有造反活动全部完结，全省各级大大小小的造反派头头，也基本以种种形式被予以关押。1973 年春开始的“批林批孔”运动，由于此后王洪文成为了中共中央副主席这一出乎所有人意外的事实，湖南的造反派掀起了以要求“平反”为重心的第二次造反高潮。但这次高潮的热度，参加者的人数，则已远远低于前一次造反高潮，并且为时只有一年左右，又很快被毛泽东“以安定团结为好”的指示所消解。1976 年的“批邓反右”运动，造反派掀起了第三次造反浪潮，这次浪潮的规模与气势，不论从参与人数，还是造反的诉求看，都远远不能与前两次造反高潮的群众性特点相比了。湖南造反派在 1976 年的造反，与其说是造反，还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渴望能稳定保护自己途径的努力挣扎。

上海的情况与大多数其他省份，有较大的区别。

在毛泽东特别的支持下，以王洪文为代表的上海造反派，自 1967 年“一月风暴”夺得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后，实际就已逐渐成为了新的官僚集团，执掌了上海市的政权。虽然，他们与上海旧有的官僚集团，始终是敌对的关系，但是，

由于王洪文们执掌政权的思维，却全部是按当时官方的意识形态运作，因此，1967年后开展的针对民众的政治运动，上海已经进入体制内掌权的造反派，只要是没有被整肃掉的，都重新扮演了旧有的官僚集团的角色。而在全国其他省份，这类整治民众的运动中，造反派则多是被当成重点整治对象的。

那么，王洪文还算不算造反派呢？

当然仍是造反派。因为，在思想体系上，上海的造反派与全国其他地方的造反派，完全没有区别。或者说，对旧有地方官僚集团的批判，始终是他们的共同意识。只是，上海造反派因为获得了毛泽东的特别支持，因而他们便能有由造反而成为官僚新贵的机会。而上海造反派之所以会欣然愿意成为官僚新贵，正是由造反派的第二个特征，即“依然接受当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这个潜在意识，在思想上产生的必然后果。

### （八）造反派的最终结果

上海造反派的情况足以表明，不论文革是胜利或是失败，在“依然接受当时的官方政治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的造反派，其造反的最终结果，都不会走向民主与法治。

但是，造反派对官僚集团的强大冲击，不仅在文革初期及中期，使成千成万的民众避免了沦为“反革命”与“右派”的悲惨命运；而对官僚集团种种罪恶的揭露与批判，则使除毛泽东以外的所有中共干部在民众心目中，永远不再有以往的那种神圣与威严（随着文革的结束，毛泽东这座最后的神像也不复从前的光辉）。这后一种造反结果，应该说对中国不至于成为朝鲜第二，而能走向改革开放，有着积极的作用。

### （九）一些有争议的群众组织是否造反派

像重庆大学“八一五”与湖南的“高司”（长沙高等院校红卫兵司令部）这类组织，都是当地造反运动的“带头大哥”，正是由于这些大学生的努力，当地的工人造反运动才得以迅速兴起。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即随着军队“支左”的介入，“八一五”与“高司”这类组织，却与很多造反派组织发生了内讧，直至协助军队对那些与他们对立的造反派进行了镇压。在全国反击“二月逆流”之后，他们都被其他造反组织视为“新保守派”，有的在北京遭到轰赶，有的甚至在本地被打垮。尽管发生了这么多周折，但应该说，重庆大学“八一五”与湖南的“高司”这类组织，依然应以造反派的身份载入历史。毕竟，他们始终拥有造



反派的第一个特征：反抗与批判地方官僚集团。

像武汉“百万雄师”、广西“联指”那样的组织，即便他们的组织名称与旗号上，也都写着“造反”二字，他们也批斗、打倒某些当权派（或是支持造反派的干部，或是被官僚集团抛出作为替罪羊的干部），甚至像“联指”的一些头头，因为在屠杀造反派中犯下的罪行，后来在广西“处理文革遗留问题”时有的遭到批判惩处，批判惩处时也把他们称为“造反派”，但他们却的确确是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因为，他们从来就是地方官僚集团的工具。“反抗与批判地方官僚集团”的意识，他们是一分钟也没有过的。

#### （十）支持造反派的领导干部不算造反派

文革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机关中，都产生了一些支持民众造反活动的领导干部，如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山西省副省长刘格平，青岛市副市长王效禹，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华国锋、候补书记章伯森，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原四川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及其夫人、宜宾市委第一书记张西挺等。这些领导干部因种种原因驱使，在民众奋起造反并有很大影响之际，都以所谓“亮相干部”（或“受迫害干部”）的特定身份，与本地官僚集团决裂（或本来就已在官场倾轧中遭到排斥、打击），站到了造反的民众一方，支持了造反活动。

这些“亮相”的领导干部，体制身份上仍从属于官僚集团阵营，却又在对待文革的政治态度上与官僚集团中维护旧秩序的许多当权者有着不同的观点；他们敏锐地看出毛泽东的态度而坚决支持造反派，却又本能地想要将民众的造反活动纳入旧有体制的秩序。因而，当他们在进入新成立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后，其掌权的方式，与旧有官僚的执政思维及手段，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

文革中，对这些“火线亮相”的领导干部，民众一般并不视其为造反派，而仍旧认定他们是“当权派”。造反派也不以其为自己的同志，而只将其视为造反的同路人。

#### （十一）张、姚、王、关、戚，不是造反派

中央文革小组中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是支持造反派的高层官僚，但他们的这种政治态度，并不是自发形成，不是来自亲身的受害经历，或因对地方官僚集团胡作非为不满所导致，而是因毛泽东的直接授意和任用，才被动具有的。

张春桥、姚文元也是这种情况。

实际上，在文革中，张、姚、王、关、戚等人，都不过是毛泽东直接使用的政治工具，是直接体现毛泽东政治意图的几个执行人、传旨官。大量历史资料表明，他们在当时的中央政治格局中，均没有半点自我的位置，而全然要以毛泽东的意旨为中心。

因此，他们的升迁或贬谪，就并非由其政治行为所决定，而完全是由毛泽东个人的政治盘算所安排。

故而，1967年8月底至1968年1月，发生的王、关、戚突然遭整肃的事件，曾令所有关注中国文革的人们都大吃一惊，并至今不得其真相。甚至连今日的戚本禹本人，也仍对毛泽东那次做法，深感迷惑。

一般的民众造反派，在其造反活动中，多少还会有一些个人的政治选择自由空间，而张、姚、王、关、戚他们却连这点自由也没有。

所以，他们不是造反派。

2015/11/3 修改

---

## 【造反派研究】

# 定义“造反派”

张光渝

1. “造反派”的字面意义涵盖很广，但这里定义的“造反派”概念，应特指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造反派。

2. 文革的特殊性决定了造反的特殊性：

其一，造反是在现政权最高领袖的鼓动下发生的，其合法性和胜负成败均由最高领袖按政治需要判定，并且标准模糊，定性随意，反复很大，多数造反派在造反过程中被淘汰。这是古今中外未曾有过的特殊“造反”。

其二，文革起始，造反派的显著特点是：自发组织起来的基层党员、群众冲击上级党委和政府，废除、夺取其领导权力，并伴有对各级领导干部的直接暴力行为，这是中共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政治运动形式。

其三，出于中国社会的正统观念，在造反夺权中最终失败的“小人物”备受歧视。“造反派”在文革语境中，已经固化为专指有政治野心的投机分子的贬义词，也使奉旨造反的人感到格外委屈。

3. 根据以上特殊性，文革造反派的定义似可表述为：

响应文革号召，以夺权为目的，发起或参加群众造反组织并在其中担任一定职务，在被认定的本单位本地区有影响、有代表性的造反活动中起骨干作用的人。

4. “造反派”定义是对文革历史背景下特定人群的政治定性。这种定性要尽量精准，既不能含糊，也不能泛化。

特将以上定义的有关界定原则具体说明如下：

A. 响应文革号召，以夺权为目的的人群，才可视为造反派。排除借文革动乱公报私仇、浑水摸鱼的纯粹自私行为。也就是说，不能把阿 Q 也当成革命党，也不能将参与抄家，吞没他人财产，进行个人报复和趁乱打砸抢的行为列为造反行为。其中有涉及刑事责任的，应以刑事案件处理。避免其借用“革命造反”的旗号掩盖自己的恶行。

B. 造反不是个人行为，而是有组织的行为。因与某领导有个人恩怨或对文革前组织处理不满的人，在文革中提出申诉或控诉，要求平反或补偿的行为，不视为造反行为。他们的诉求是个人性质的，目的是为自己平冤。即使有一些过激行为，即使其依附于某个群众造反组织，也与“造反派”的概念有所不同。

C. 参加群众组织这一身份的规定，可以将没有参加群众造反组织，但不同程度参与了造反行动的领导干部排除在“造反派”概念之外，这有利于概念的明确和统一。例如，不能把马天水说成“造反派”，因为他没有参加工总司，而是被工总司“解放”后担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他的问题与“造反起家”有区别。比如王洪文，贵为党中央副主席，但仍算是造反起家的造反派，因为他曾是上海工总司的司令。

D. 规定在造反组织中任职和起骨干作用，为的是最大限度缩小“造反派”的覆盖面，将参加造反组织的绝大多数一般成员排除在“造反派”概念之外。这符合文革运动的实际情况。

E. “被认定”一词，是在文革的特殊历史背景下使用的。文革社会矛盾的基本表现形式是领导干部与造反群众的对立和冲突，最终以领导干部的全胜而告终。领导干部代表了执政党，代表了革命传统，代表了社会秩序，而造反派则成为制造动乱的反面势力。因此，文革初期的红卫兵和“西纠”、“联动”分子不被“认定”为造反派，因为他们活动的时段尚无“夺权”概念，他们的主要冲击目标除校领导外，也不是党政机构和主要领导干部。即使有个别人和个别组织有类似行为，也被认作“自己人”。同样，聚众冲击毛泽东驻地的武汉“百万雄师”首领，文革后也不被“认定”为造反派，因为他们的群众组织反对的是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央文革势力，拥护的是以陈再道为代表的老干部。虽然这种“认定”有鲜明的主观色彩和选择性，但它明示了文革矛盾的对立面和最终结局。如果没有

这个“认定”，文革十年，人人都有可能在某一时某一事上算是造反派，“造反派”的概念也就没有意义了。

F. “造反派”的概念是政治概念，不是法律概念。文革刚刚结束时，急需稳定局势，收拢人心，所以对参与造反的头面人物进行清算，这是政治斗争的必然结果。但造反派不是因为“造反”本身被清算，而是由于在造反活动中伤害、拘禁、诬陷他人，破坏国家财产、危害公共安全、组织策划武斗等具体罪名被清算。“造反派”概念不涉及犯罪行为。文革并不仅仅只有“造反派”和“走资派”两极概念，而不算作造反派的人在文革中也各有各的账，但此文只讨论“造反派”概念，不及其他。

以上观点，不尽之处，请予指正。

---

## 【造反派研究】

### 略谈“造反派”定义

周伦佐

按：本刊向《“文革”造反派真相》一书作者周伦佐先生去信征求其对“造反派”一词应如何定义的意见，他抱病回信简要谈了以下想法。

在文革运动初期、在民间、在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一——

凡“受压”而反者，为造反派。这些人多少对个人处境和社会现实感到不满，不太喜欢用阶级出身标准看人、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事、用阶级分析方法看书。“受压”情况各种各样：因历史污点、因政治嫌疑、因出身不好、因得罪领导、因犯过错误、因表现落后、因地位低下、因经济贫困、因性格逆反、因心理压抑、因连带影响……其行为特点具有异端性，无恃有恐。

凡“奉命”而反者，为保守派。这些人大多对个人处境和社会现实比较满意，长期习惯用阶级出身标准看人、用阶级斗争观点看事、用阶级分析方法看书。“奉命”情况形形色色：奉上级领导之命、奉中央号召之命、奉全国形势之命、奉政治风向之命、奉历史记忆之命、奉驯服工具之命、奉正统思想之命……其行为特点具有正统性，有恃无恐。

北京老红卫兵主要是闻内部消息而动，属于保守派无疑。

聂元梓既有“受压”（四清挨批）一面，又有“奉命”（闻风而动）一面。上海工总司同样：既有“受压”（陈丕显压制）一面，又有“奉命”（张春桥支持）一面。所以带有既造反又保守两种色彩。

必须强调：这个定义要在三个限制之下方才有效：

第一是限制在运动初期；

第二是限制在民间范围；

第三是限制在共同的意识形态背景下。

按照第一个限制，那些等到形势明朗大势所趋时参加造反的人，就并非因为“受压”，其中包括许多因为出身好身份红被推举到群众组织负责人位置和各级革委会的人。此外，运动后期官方树立的典型人物张铁生、黄帅之类也不属于造反派范畴。

按照第二个限制，四川的萧、李、廖和刘、张之类文革前被打下去的干部起来翻案，因发生在和归属于民间范畴，可以称之为受迫害干部造反。而王、关、戚之类高层人士则完全不在这个考察范围。

按照第三个限制，遇罗克之类具有自由民主思想而借机造反的人，可以排除在造反派之外。

文革是个亿万人参加的运动，造反者的情况千差万别，要给出一个适合于每一个人的理论定义，几乎不可能。只能总体把握，大体概括。

以上意见供参考。

---

【忆旧思亲】

## 一个理想主义者的毁灭

### ——探寻父亲悲剧之源

徐小青

**作者简介：**徐小青，女，祖籍江苏淮阴，1953年8月生于四川泸州。1966年小学毕业考入宜宾一中，因遭遇文革而辍学。1970年下乡插队。1972年推荐到重庆钢铁学校（现重庆科技学院）读书。1975年毕业留校任教，其间曾调校学生处从事学生工作，并考入重庆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习。2008年退休。

## 前言

我的父亲徐嘉陵（家麟），生前系四川省宜宾专区水电系统党组书记、专区水电局第一副局长。在他人生的英年惨遭扼杀。那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时期：1968年4月30日下午，他被外来“革命群众”活活打死。那年，他

还不满 46 岁！

父亲的不幸遭遇留给我永远不能痊愈的心灵创伤。尤其在临死前忍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断断续续发出“为什么……为什么……”的绝望声，像一把无形的刀子，每每扎在我的心灵深处，迫使我苦苦地探寻和思考：

父亲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人生态度是积极乐观的，为何却以悲剧结局？我为何来到这世上又为何要承受这痛失亲人的心灵苦难？父亲和蔼可亲的音容与被害时的惨景是如此的反差强烈，永远无法在脑海中消失！我渴望了解父亲走过的路，探寻父亲的悲剧根源。

自 1997 年开始，我多次去江苏祖籍地寻根，拜访亲友，了解到许多往事；1998 年又发现了父亲留下的日记和工作笔记等，我走进了父亲的精神世界，一步步认识了父亲的心路历程及其悲剧的根源所在。2010 年拜访了父亲青年时代的



的挚友、上海文化界前辈左泥先生，他鼓励我写出父亲的遭遇，我很受鼓舞。

然而俗务缠身，时光飞逝，2004 年又痛别母亲。2008 年秋退休有闲了，我即参观了国内唯一的文革蒙难者纪念地——广东汕头澄海塔园文革博物馆，更受到鞭策，于是开始动手整理相关资料，以父亲的日记笔记贯穿牵引，编写自印了讲述父亲人生的书《永难忘却的……——父亲的路》，此后又在美国天问学会文革公共论坛集《历史期待拐点》中发表了文章《一个人的遭遇——探寻父亲悲剧之源》。现综合整理，发表到《昨天》。

（上图：父亲徐嘉陵遗像。）

惟愿为后代留下史实；惟愿父亲天上有知，灵魂安息！

## 追求与奋进

1922 年农历 10 月初八，父亲出生于江苏淮阴一个平民家庭，祖父以教私塾为生。童年的父亲在兄妹中最聪明，能背诵祖父教的书。抗日战争后期，祖父母死于贫病交加。

面对国破家亡、民不聊生的乱世，父亲积极寻求救国救世的真理。如同在一片汹涌的汪洋中探索，他登上了那条当时很多人都认定能使国家走向光明前途的大船——抗日战争后期，他在苏南接近了中共地下党并积极为其工作。

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上海编辑、作家左泥先生，回忆与父亲的往事说：

那时候，你满怀正义感，想为社会为国家作一番事业，帮助友人在上海郊区筹办一个小学，你到处大声疾呼：“农民百分之九十是文盲，这样的社会不合理！”你为学校写校歌，你给学生上课，讲社会的不公平……

我为你失业后的生活担心。但你说，人生不能只是为了个人的生活，总要有点理想。你发表了你怎样理解人生的文章。你把人生比作天上的银河，个人比作银河里的星星。一个人的生命、能力是有限的……你结束了学习陶行知搞农村教育改革社会的幻想，积极投身到党所领导的群众斗争中去。……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你时刻都有坐牢杀头的危险！那时你尽管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你出于对党的信仰，已经把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为党的事业宣传奔走了。

和你相处的那些岁月里，我从来没有看见你穿一件好好的衣服，美美地吃一餐饭，春夏秋冬总是见到你废寝忘食的读书和工作！

父亲 1949 年 2 月成为中共正式党员，他在笔记本扉页题字：

必须每个苏维埃人……总结自己的工作，毫无畏惧的检查自己，勇敢地批评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为改善自己而不间断的工作……

1949 年 7 月，父亲和母亲（上海知识青年）在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集训，10 月 2 日，夫妻双双随军徒步数千里，奔向大西南。父亲任某中队组织干事兼分队长。父母于 1949 年年底到达川南，开始为新生政权工作。

建国初期执政党顺应了人民安居乐业的愿望，各行各业得以发展。父亲的才能受到重用，五十年代曾任川南区党委秘书、股长、隆昌县副县长、泸州专署农业科副科长、专区农业局副局长等职。他更加废寝忘食地工作。

父亲为一个全新时代的到来而激动，为成为新社会的建设者而自豪。他在五十年代初期的日记中写道：

整日在筹委会工作……晚饭后参加支委会，晚间又在行署开会，十一时才回来。

一个老年的农民代表说：我们把这个大会开好，实行毛主席指示的减租、退押、清匪、反霸……从这个会上可以看出，各界人民对于建设一个新的国家怀着无限的热望……显示出我们国家正在向着一个新的方向前进！……

我们今天较艰苦的生活，也是为了换取下一代的幸福，意义是伟大的！……

办完了一件大事，把省里派来的一个民主人士工作组送走了。他们对新时代的感受还是比较初步的，唯一使他们惊异是党和政府与人民的亲切关系……

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中大量阅读马恩列斯毛的著作、钻研政治理论，并给干部和工作人员讲课。他在“学习心得和自我鉴定”中写道：

幼年时代受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影响，认为社会是需要改良的，而改良的主要方法是普及教育和文化，因此怀抱一种乌托邦的幻想。……

……我当初参加革命，只是由于不满国民党腐败的统治，没有想得那样远。……现在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有坚定的信心，愿意牺牲个人利益，在党领导下……

父亲从富饶的东部平原，来到贫穷落后的西南山区，做着从没接触过的农业工作。他克服文化、语言、风俗、生活习惯的障碍，在短时间、特定环境中完成着角色的转变。他积极学习和实践，为贯彻党的农业方针而勤奋工作。他写道：

学习联共党史第十一章，作了笔记。结合阅读邓子恢同志的报告，对农业工作如何配合合作化运动有了一些了解。

……帮助农民割了一阵麦子。找老农民李四摆谈秧田管理经验……

1957年，强大的“反右”政治运动袭来，据母亲说，父亲“差一点陷进去了”，他听从政治舆论宣传，唯有不断自我反省，自我批判。他在日记中写道：

思想上酝酿着搞一个自我思想批判的东西……

保尔说过这句话：“生命对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当我将来回首往事时，我已把我的生命献给世界最伟大的壮丽的事业——共产主义”……曾几何时这句话的音响不再那样激动我了……积极的东西后退了。我要经常的不断反省自己，除去思想上的灰尘。……

而立之年的父亲，生命犹如滔滔江水一往无前，奔腾在异乡贫瘠的土地上，在清苦的物质生活中，努力奔向他崇高的理想……

## 困惑与忠诚



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家处于极左路线统治之下，造成此后的三年大饥荒。父亲在贯彻上级农业方针中，已经发现有错误并为此焦虑。他写道：

1957 年 12 月 9 日

今天收集了一下全区晚稻和小春情况，晚稻的减产趋势已注定了，这将使今年少收几亿斤粮食，这是一个大问题。如何使明年避免今年的错误，更进一步避免明年可能发生的错误？这是我终日盘旋的问题，人力、方法……

父亲同一些干部抵制了极左的做法，解散农村食堂、下发自留地，却遭到打压。1959 年底被定为“右倾”。他的思想检查是这样的：

我思想上几个问题

一、公社化是否符合生产力水平？……

二、……对于一般人来说，要求建立共产主义思想是否有必要？是否过早？

三、经济、技术工作怎样才算不脱离政治，群众的生产生活要不要党的领导？

四、我们的某些要求（例如双季稻）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我为什么朝坏的方面估计多。

今天看来，当年父亲的思维应算是清醒的，但在当时却受到批判。他的头脑被那套极左理论冲刷着，力图纠正自己本来正确的所谓“右倾”错误，可悲可叹！

迷信“组织”的父亲诚恳反省、自我批判，没有怨气，没有灰心，企图用“革命思想”战胜个人的困惑，唯恐自己跟不上党的要求。他写道：

1959 年对我也是一个不平凡的年头，它是对我资产阶级世界观的总清算……49 年是我第一次革命的转折点——我参加了党。而 59 年将是我第二次革命的转折点。……我毫不痛惜过去获得的一切，重头做起重新学习……自己批判得尚不彻底……

父亲在逆境中还不忘教育孩子，他在 1959 年底的一则日记中写道：

带小青去吃了一顿豆花饭，味美价廉，很好。她还想再吃馒头，没有给她吃，小孩子从小就应养成照顾别人的习惯，看来我们几个孩子还得好好教育。

1960 年 1 月，父亲被下放到农村，他愉快地服从组织处理，怀着新的希望

奔向变相劳改之地，并积极改造思想。这一年他 38 岁。

陌生的土地，艰辛的劳作，一切与过去在大都市度过的青年时代是多么大的反差啊！但他乐观地对待这一切，劳动之余仍然学习政治理论、农业知识，坚持写日记：

夜间开始下雨。穿了蓑衣，带了斗笠，种甘蓝的秧子，我担任挑秧工作。因为生疏，弄得浑身淋漓。……阅读毛主席的农村调查序言和跋。……

看电影《铁窗烈火》，是写的王孝和，引起了我对上海生活的一些回忆。

下午又阅读了毛选二篇：学习和时局。……

又阅读了《星火燎原》中‘跟毛主席长征’一段，思想豁然开朗。只有思想真正解放的人，才能经常保持乐观的情绪。……

其时正值饥荒年，食物严重匮乏。1961 年，三个孩子由于饥饿和营养不良得了伤寒重症，来回住医院，让父亲和母亲疲惫不堪、经济拮据……

父亲在艰苦的劳动生活和无形的精神压力下耗费着年华。偶尔也为个人前途未卜而隐忧，他的命运把握在高高在上的“组织”手中。他在 1961 年日记中写道：

Z 专员来了，找 Z 谈了一下一年多来劳动和思想情况，他作了一些指示，……主要是要我下决心改造思想，作长期打算，……他的话引起了我很长时间的思想斗争。……

1961 年 8 月，神圣的“组织”终于通知父亲，开始对他的问题进行“甄别”。为了这个“甄别”，他写材料、反复申诉、来回跑，不顾官僚小人们的拖沓阻扰。同时仍然积极学习马列毛政治理论，用以支撑他的精神信仰。

1962 年 4 月 8，父亲终于离开了他下放劳动、改造思想两年多的农村。再次被党启用，于当年 7 月被任命为宜宾专区商业局副局长。他在日记中写道：

通知马上发出来。Z 专员那里的昙花又开了，……

父亲即将上任之际看到昙花开了，似乎预示着他的命运转折只是短暂的辉煌，恰似昙花一现。几年之后厄运降临……

父亲在来之不易的岗位上，精神饱满地工作。他在日记中写到：

今天是阴历十月初八日，我的生日，恰巧在家……40岁了，除了身体略有感觉之外，思想上简直一点没有这个感觉。……

从父亲日记中可见：业务工作繁忙，政治运动频繁，文字中充斥着“三反”、“三清”、“反修”、“斗争”……；哲学笔记中的抽象理论与“有人毒死小猪”、“偷吃花生”的实际生活反差很大。但父亲仍然乐观地实践着他的人生抱负。

1964年底，父亲被任命为宜宾地区水电局第一副局长兼党组书记，负责全面工作。他雄心振奋，精神抖擞！在组织建设长江支流水电站的工程中，父亲身着劳动服，脚穿胶鞋，日夜奔波在艰苦的工地上。他在日记中写道：

夜十二点钟起床，一点上班。  
突击队的人有的已先到了。

永宁河在怒吼着，人流马上组织成一条线，抬的抬，传的传，大石头向河心里滚去。

这是社会主义的人，是觉醒了的人，眼看着世界在我们手里变样，这是多么愉快而值得兴奋的事业啊！……

（右图：父亲〔左2〕在水利工地上。）



自饥荒年渐渐结束、父亲重新工作后，我们家过了三年比较安稳温饱的日子。父亲总是忙，偶尔闲暇，总是不忘教育鼓励我们好好念书，记得他几次对我们说今后不要上大学，中学毕业后就响应党的号召到农村去，建设新农村……

1965年报刊加紧了对文艺领域的批判，文革序幕拉开。父亲写道：

老×来谈了一些最近文艺上的情况，颇有开悟。过去文艺作品特别是外国的古典作品，大都是宣扬个人主义的东西，使人受毒害不少。迷惑于这种艺术形式就会上当。

可见，父亲被重新启用后，对于党所宣扬的一切，更加深信不疑，铺垫了他日后的悲剧！

## 陷身动乱漩涡两次上访埋下祸根

1966年夏，毛泽东发动了建国以来最大的政治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利用十七年来灌输给人们的个人崇拜和红色理论，煽动各行各业起来造反：破坏传统文化，砸烂公检法，层层夺权……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大倒退，刚有点好转的物质生活重陷贫困。更令人发指的是，发动者挑起人整人，制造恐怖血腥：在运动中，被逼自杀、武斗残杀、批斗致死、阴谋杀戮……达千万人以上。许多忠于毛泽东忠于共产党的受害者至死也不明白这杀身之祸的根源！

父亲和千千万万无辜者，不幸成了这场历史浩劫、民族灾难的牺牲品！

1966年夏末，文革浪潮涌入四川宜宾，前宜宾地区当权者刘结挺、张西挺夫妇（因在官场倾轧中失势，文革前已被撤职并开除党籍）企图利用文革之机翻案。眼看他们在北京渐起势头，宜宾地区和四川省的当权者于1966年8至12月组织多批人员上京反映情况。

8月下旬，父亲受宜宾地委指派，担任宜宾地区干部上京代表团副团长。其实，作为原来的泸州干部，父亲与刘、张并不熟识，也无个人恩怨，参加上京代表团反映刘、张问题，完全是“党叫干啥就干啥”，听从组织安排调遣。（注：五十年代原有泸州专区，与宜宾专区同级，1959年庐山会议后，泸州地委书记邓自力因率先解散公共食堂、给农民划分自留地，而与副书记崔璋、陈怀堂一起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崔陈反党集团”，受批判处理后，泸州专区被撤销，原辖区并入宜宾专区）。

父亲在积极响应文革运动的同时，仍然在认真地做水利工作。9月初宜宾遭遇百年不遇的大洪水，他拍摄了宜宾大洪水照片：公路被淹没了，洪水涌入城市街道……

大洪水仿佛预示着这场运动将带来的后果！

1966年9月，13岁的我考入重点中学，还没来得及体会早已憧憬的中学生活，就遭遇文革：停课闹革命，参加学校里斗争校长、老师的大会，跟随高中学生到社会上“破四旧”抄家……11月，父亲支持我参加“红少年长征队”步行串联。临行前，还交给我一封信，让我到成都后去省委招待所拜见一位他的老领导、老红军赵妈妈。我们由老师组织带队，背着行李从宜宾步行到成都，历时半月。到成都后跟着别人看斗争大会、抄大字报……这个不寻常的秋冬，全家人都卷入文革浪潮之中。二姐到北京参加了毛泽东第四次接见红卫兵的大典，回来后劲头十足。后来社会上各单位分了派别组织，二姐自然是造反派，而在泸州上学的大姐是泸州保守派，我则追随二姐参加自己学校的造反派组织。由于我们从小

就别无选择地受到红色教育灌输，在“保卫毛主席，反修防修，经风雨见世面”的宣传下，满怀激情“干革命”。今天想来，多么幼稚愚昧啊！

在混乱的局势中，父亲仍然在认真负责地做水利工作。他在工作笔记中记录道：

1967年3月17日

- 1.洞口电站建设问题，下面反映比较强烈，是广大干部群众的要求……
- 2.对促进山区“四化”、农副业生产是完全符合的。
- 3.洞口电站修建完全是就地取材，符合节约精神。
- 4.对装机容量二台1000千瓦规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修建这个电站在政治上有很大的意义。1)这是少数民族边远地区。2)在文化大革命中上的，用事实宣传毛泽东思想。……

1967年3月30日 座谈供电情况

全县两个电站，运行二台机组，大车口水轮机130马力，发电机100千瓦；业习二台130马力，发电机2×68千瓦，三台机组已联网236千瓦。……枯水天发50—60千瓦，满水天可发150千瓦。

1967年4月3日 泸州水电会议精神

会议开了三天，×副司令员参加了会议。参观了玉屏和万寿公社，会议参加人有各县生产委员会和水电局的负责人和革命组织的负责人。

第一天参观，第二天介绍经验。……第三天安排了工作。这次会议中心，主要是解决两个大问题，一是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政治工作做到生产队。二是如何掀起以防旱抗旱为中心的群众运动。具体问题没有作什么研究……

1967年4月初，按毛泽东指示，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召开会议，为文革前被撤职并开除党籍的刘、张一伙正式平反，中共中央的平反通知里称刘、张一伙为“坚持党的原则的好同志”。消息传到四川宜宾，引起震动，许多干部、群众不服，不相信中央会作这样的决定，重新上京告状。

1967年4月30日，父亲也同一些“想不通”的干部第二次上京，他们给中央文革小组写信，反映刘、张在宜宾的问题，岂料此案已经由毛泽东主持平反，谁敢推翻？上访者不被理睬，反而受到威胁、抓捕。父亲因此埋下祸根。

几天之后，5月7日，经毛泽东批准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下达，飞机在宜宾上空撒下大量“红十条”传单，刘、张成为四川“新生红色政权”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

父亲只得从北京返回，暂时在成都躲避，认识新形势。

刘、张一伙得势，引起宜宾地区的保守派与造反派从辩论、摩擦到大打出手。1967年5月13日，宜宾两大派发生以钢钎、棍棒、砖头瓦砾为武器的武斗。

我和二姐站在拥护刘、张的“红旗”派一边，参加了这次“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惊心动魄的武斗，从当时母亲写给父亲的信，可见一斑：

嘉陵：

家中一切都好。小绿和小青从5月13号宜宾大搞武斗以后，一直在执行任务——守卫大楼。小绿腰部受了一点震动（是从房顶上跳下来，为了躲避对方的进攻），现已全部好了，她俩都是“红旗”兵学生，现在仍继续在服务。

我于5月15号已正式退出组织，因为我认为不管是哪一个组织，参与武斗我是坚决反对的，这是不符合“十六条”……

宜宾这股武斗的歪风也不知是谁吹起的……这次伤亡很大，绝大部分是基本群众，听说14号打得最凶。那天因是星期天，幸好我未出街，很多来往群众，有的都白白遭木棍、钢钎当场几闷棒活活打死，以后几天，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五类分子竟然也拿着凶器恶狠狠地在街上乱指挥起来，发号施令，见不同观点的人就抓、乱打。

现在打、抓人已基本停止，街上已基本恢复正常。……但听说昨晚又在戒严……我们在宿舍里不常出街，因为“合办处”现在临时到合江门仓库来办公了（只有七、八人），那边的办公大楼已被破坏，屋顶穿天，财产家具有的拿跑了，有的偷了，遍地皆是残缺不齐的废物……玻璃门、窗都破坏了，档案文件翻乱了……一时不能进去。



听小五说你的“声明”已贴出（是用大字报写的）。再谈。

祝 学习好！身体健康！

桂芬 1967、6、2、下  
午

母亲信中所说的“声明”，是父亲迫于形势（也是出于对毛泽东坚定不移的信仰），写了表态拥护中央“红十条”的声明。（上图：父母于五十年代合影。）

### “形势大好”迫害加剧

1967年6月，父亲回到单位，被已经夺权的造反派定为“走资派”。一系列的迫害接踵而至——被抄家、写检查，无休止的自我批判……

父亲被抄去个人的资料，还得表态支持抄家的“革命行动”：

1967年8月16日下午，水电红旗部队在我家及办公处进行搜查黑材料，这是一个革命行动，我坚决的支持。除文件全部由水电红旗部队的同志收回归档外，有下列几件由水电红旗部队同志带回去审查：

1. 1959年工作笔记两本
2. 1963年工作笔记一本
3. 1965年工作笔记一本
4. 1967年工作笔记两本
5. 学习主席著作日记一本
6. 1967年检查及记录便条本四本
7. 给我爱人张桂芬信5封

有一次父亲去泸州，对我大姐（当时她是反刘、张的泸州红联站一派）说：“红十条”下来了，你站错队了……大姐看到一向乐观的父亲此时却神色黯然、一脸迷茫，她深感震惊，从此厌恶政治。

父亲从1967年6月下旬开始不停地写检查，纸张堆积如山。检查题目有：

我在工作中的严重错误  
我上京告状情况交代  
我文革前后违反毛泽东思想的言行  
我对“刘张”问题的错误认识是怎样转变的  
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父亲认真地检查自己犯了“路线错误”，给自己戴上许多政治帽子，他写道：

我犯错误的思想根源  
参加革命由于主席著作学得不好，又中了“黑修养”的毒害……  
名位观念……个人主义……奴隶主义……雇佣思想……修正主义……折中调和思想，保守派

认为上级总要比自己正确，这些领导人参加革命的时间都很长，受过许多锻炼，他们是上级党组织派来的，是代表上级党组织的，如果他们有问題，上级会

加以撤换。因此运动一开始，他们怎样布置我就怎样贯彻。同时，当时我对这样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思想上毫无准备。……

有人写材料揭发我父亲：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期与“托派”有联系，在“反右”运动中有右派言论，等等。父亲对于这些不实之词也进行过辩解，他毫无办法地陷入政治斗争的可怕漩涡中：

关于过去几个问题的说明

一、所谓我在上海地下工作时与“托派”有联系的问题

这个问题是不存在的。这是1955年肃反运动时，有一个和我在上海认识的同志×××，他在运动中乱说的，经八、九个月的审查，已完全予以否定。当时主持审查我的问题的是于××同志，现在专区卫生局（局长），还有一个审查小组。他们在审查结束时都和我谈了一下情况，并已作了结论。

二、罗××所谓揭发我在1957年整风反右的右派言论的问题

他所说的几条完全是他捏造的黑材料。……在整风中检查过两次，主要是我写了当时副专员陈××的一张大字报，他认为我攻击他……

整风最后结束在1958年9月，我又作了检查，大家也提了意见，但也根本没有罗××所说的那几个问题。当时和我在一个小组参加总结的有范××、王××等十多人，可以查证。

父亲平静地接受大会小会批斗、挨打，挂沉重的黑牌，衣服背后被写上大墨字，罚站板凳……从无怨言。

父亲还被罚扫厕所、给食堂拉板车，家门上被贴黑对联，又被造反派强行占去一间住房，赶走从泸州回宜宾家中的大女儿……

在不断的批斗中，父亲经常挨打：头撞墙、手枪戳额头、腰椎胸肋受伤……面对如此暴行他却表现出宽容，记得他一边给自己伤处贴膏药一边平静地对母亲说：“接受群众批判嘛，难免过火。”

1967年7月，宜宾专区的重要城市泸州爆发大规模武斗，反刘、张的红联站一派占了上风。掌握地区大权的刘、张一伙发动“武装支泸”（组织动员四川其他地区拥护刘、张一派的武斗人员前来参加攻打泸州“红联站”），武斗规模升级，甚至动用了兵工企业的正规武器，两派死伤无数。武斗使得社会秩序大乱，直接摧毁人民的生命财产，百姓生活再遭劫难。

然而，就在全各地武斗烽烟四起的7、8、9月间，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却称赞：“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



什么时候都好。”其时，全国已有成千上万人包括各级领导干部、科技人才、艺术家、底层百姓死于非命。

就在这一年，一些父亲熟悉的领导干部被迫害致死：宜宾地委副书记李鹏基自杀，宜宾交通局局长张存礼被批斗致死，宜宾地委组织部长刘国章被逼跳楼身亡（注：我们都亲眼见到遗体惨况）……听到这一个个噩耗，父亲肯定有想法。有一次，他躺在凉椅上沉思，像是对母亲、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我们这些人能不能活到 80 岁啊？”

### “学习班”燃起希望却又再埋祸根

1967 年 10 月下旬，父亲被通知参加由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筹备组组织的“犯错误干部”学习班。父亲抱着很大的希望前往，认为这是“党和毛主席给犯错误干部的机会”。父亲在学习班积极学习毛泽东著作、中央文件，努力理解文革运动，他诚恳地剖析自己：（下图：父亲文革中所写的部分检查。))

1967. 10. 21 学习《为人民服务》  
思考记要

第一段：我们这个队伍是“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

我在参加革命的时候是不是抱着“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而来的呢？对我们革命队伍的认识是怎样呢？参加革命以后的思想改造是怎样呢？



第二段：为人民利益工作就无所畏惧。

人活着是为什么？为什么而死才是死得其所？

我对人生的看法，过去和现在？哪些是对的？哪些是不对的？

1967. 10. 25

进学习班以前的思想情况

等待、埋怨、消极、被动、无可奈何。

1) 埋怨 认为把我的问题作为敌我矛盾是搞错了……检查不过关，揭发又说不够彻底……

2) 抵触 衣服上写上字，门上贴上对子

3) 等待、消极、被动。

认为问题一定弄得清，但自己没有办法，是别人……不准自己改正错误。

计划大批判结束后，可以处理了，最多再批判半年 30 次，站板凳也不会再升级了。

仍缺乏改造自己的决心，认为“私”字不大好去掉，年纪也不小了，孩子也大了，将来做一个一般工作，不会犯大错误，这样一生也就平平安安过去了，与世无争。准备减薪、降职。

进学习班以后的情况：

兴奋、热情…认为自己的想法终于实现了。

在家是“解放”不了的，错误最大，又是第一号罪魁，别人都可以“解放”，自己也不可以“解放”，只有到这里才能“解放”。这是党和主席对犯错误（的人）最大的关怀。

对怎样检查、怎样揭发还没有一个方向，怕时间太短解决不到问题。

宜宾地区革筹组组长王茂聚对学习班的干部说“同志们放心好了，我们一定要把你们和牟、沈、贾分开”（注：摘自父亲手记。牟、沈、贾系宜宾地区被打倒的“走资派”）；父亲后来还找过王茂聚谈自己的问题，王仍然说的好话（注：母亲后来告诉我的）。

父亲在学习班里，受到“路线斗争”的蛊惑，出于追求真理、坚持原则的一贯立场，写出大字报为 1959 年因“右倾”被撤职下放、文革中又受到冲击的原地区领导邓自力等辩护。他天真地认为，既然刘、张一伙都平反了，邓自力他们不是更应该平反？在父亲写的检查材料中可见：

……我写了一个《邓、崔、陈冤案前前后后》……又看到王茂聚同志曾经表示支持邓自力起来造李牟死党的反，所以一直认为他们是比较好的，没有料到（邓自力）他们会反对红十条……

他哪里能够料到，党阀政客之间有许多他所不知道的利益矛盾。被农民誉为“邓青天”的邓自力等人，如果得到“解放”，其资历、声望、能力都远在现在当权的刘、张一伙之上。这一下触犯了他们的既得利益，父亲再次埋下祸根。

我一直不解，为何父亲在对自己在极为不利的形势下还作出冒险的斗争？现在想来，依据父亲的为人，他也许是想到此前那些熟悉的同志冤死而企图讨回公道吧。在自己的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的时候还去为他人鸣冤叫屈，仗义执言，这就是我的父亲。

父亲始终对组织上抱有幻想，他相信自己的问题最终是能够弄清楚的，以为只要自己认真学习，诚心检查，紧跟党中央，接受“群众运动”侮辱人格的残酷批判斗争，最终党还是能够看到自己的忠心而给予出路的，就像 1962 年一样。然而他错了！

### 晴天霹雳

1968 年 4 月 27 日，宜宾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此时父亲已属“走资派”批斗对象，不能参加公众庆祝活动，但他仍不失乐观。记得头天晚上，他还高兴地为我们准备干粮，满怀希望地说：“成立革委会是毛主席的指示，好在我们家也有人参加……”

岂料三天后，父亲竟惨遭横祸！

1968 年 4 月 30 日下午，在一场预谋策划下，宜宾的幕后凶手指使外地来的造反派打手，用拳脚、锄把、皮鞭将父亲活活打死……

那天中午，毫无所知的父亲去单位之前，对我说：“等我下班回来做面条。”

下午三、四点，明媚的春天突然晴空霹雳，暴雨倾盆，约一小时又骤然停止。那正是父亲惨遭毒打的时候！老天有眼，凶手日后必遭天报！

五点多，生命垂危的父亲被人拖回家来，他在半昏迷中发出“为什么……为什么……”的悲惨声……

七点多，母亲好不容易找到工人，将父亲抬到医院。

十分钟后，父亲在心灵和肉体的无比痛苦中去了另一个世界。

这一天正是他上京告状一周年！

父亲的遗体，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血迹，全是大片青、紫、黑的内出血伤痕，惨不忍睹……

我清楚记得，父亲火化后的骨灰雪白晶莹！他是个无私的纯粹的人！

父亲被害时的遗物有：写满墨字的衣衫、被打断的手表带、半支钢笔、一只鞋，还有当月交党费的收据，以及被害前一刻没有抄写完的自我批判的“检查”及原稿，原稿落款日期就是当天“1968. 4. 30”，其中写道：

……我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很低，把复杂的阶级斗争简单化了。

……运动初期我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牟××等的黑指示……死保牟××，……牟××被揪出来以后，我开始进行检查……又站错了队……最后发展到上京告状，炮打中央文革，犯了更加严重的错误。

在犯了错误以后，经过群众的批判斗争……也产生了等待处理的消极思想，

以为等将来把自己错误审查清楚，干部不当了，搞一个一般工作，“无官一身轻”

……通过两年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教育，自己认识到要改正错误，只有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无限地信任群众。我已下定决心，现在虚心诚恳地接受群众的批判和教育……就是再打倒也要通过改造思想站起来，跟毛主席革一辈子命，为共产主义而斗争到底。

母亲5月在给淮阴三叔的信中，讲到父亲遇害前一天晚上的情景：

4月29日晚上，他还给大哥写了一封信，谁料到第二晚上就死去了！前段时期，他很想文化大革命以后要求调回江苏老家参加工作，他不只对我说过一次……

可见，父亲已经有些厌倦了翻来覆去的政治斗争，产生了回到千里之外老家的念头，遇害前夕还给久不联系的大伯写信，然而……

正值英年的父亲，就这样被那荒诞之极、残暴之极的政治运动吞噬了！留给五个女儿永远的悲痛阴影和血的教训！

1979年元月父亲追悼会前夕，我痛忆往事，写了《父亲，我永远的痛！》记录了那时的心情——

“爸爸死了！爸爸死了！！”十年来，一触到此，我多少次从朦胧中惊醒，爸爸呀，我无论如何不敢想：你这样温雅的人，怎么忍受得了那种惨无人道的毒打？你这样充满活力的人又怎么能够一字不留咽下最后一口气？！爸爸，你是死不瞑目的呀！

我永远忘不了那个惨痛的日子……

一九六八年四月三十日，本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这天中午，我们姐妹同爸爸一起正吃饭，就有人来叫爸爸下午准时去单位。午睡一会儿后，我对爸爸说：“天热了，晚饭我煮稀饭吃吧。”此时爸爸正抱双膝坐在板床上，目光看着地下陷入沉思。听见我的话，才一边穿鞋，一边像往常一样温和地说：“少煮一点吧，晚上我回来做面条。”接着就去单位了。万万没想到，这竟是爸爸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啊！

我清楚记得，下午四时左右，晴朗的天空突然大变，刹时炸雷四起，暴雨倾盆，大约一小时后又骤然停止。这时，忽见两个大汉架着一个人，踩着地面积水往我家来。啊，是爸爸！只见他双目紧闭，脸色死灰，头歪向一边，光着一只脚。我脑海里轰地一声，顿时浮现出小说电影中的那种情景，只感到一阵恐怖，不知

失措，眼睁睁看着他们把爸爸甩在板床上扬长而去。我们姐妹三人忙围上去，爸爸勉强睁开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叫妈妈……办公室……还有……包包……手表……”没说完又昏了过去。二姐果断地对我说：“你先看着爸爸，我去单位打电话给妈妈。”（那天妈妈在值班）她飞快去了。我和妹妹更加害怕，不知该做什么，终于说：“爸爸，我扶你到大床上吧……”可这时爸爸已经听不见我的话了。忽然他又出了声，“啊……啊……”痛苦地呻吟，夹杂着些含混不清的话，模糊地分辨出几个“为什么……为什么……”，每想到这一情景，我悲愤的心情难以平静，在战争年代牺牲的革命者，还能死得明白，死得其所。而在和平的今天，一个忠诚的共产党员竟然不明不白地惨死在共产党的政治运动中，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惨痛的事吗？我勉强架起爸爸高大的身躯向里屋大床迈动，然而还没走近，他就一步栽倒在小床上……这时候二姐回来了，说那些人不让她打电话，她让我赶快跑去叫妈妈。我一路狂奔，心都快蹦出来，但见了妈妈却不敢讲爸爸的惨状，只说爸爸又被打了，催促她快快回去。当我们赶到爸爸跟前，他已经奄奄一息了，妈妈到处找工人，好不容易才将爸爸抬去医院，这时已是晚上七点钟。

我和妹妹惊恐地等待着，谁也没开灯吃饭。我盼望妈妈和二姐快回来，又十分害怕她们回来，因为，因为我似乎已经看到爸爸身上死神的影子，我的心在狂跳……

妈妈终于回来了，却面对我们说不出话，我们一切都明白了。

开始，我和妹妹还憋着声哭，后来就不顾一切地悲嚎了，爸爸啊，我才十四岁，妹妹才十一岁，你就这样丢下我们，你死得这样惨，死得这样快，你没给我们留下一句话，你安心吗！？

这个夜晚，妈妈忍着巨大的悲痛，由二姐陪着去给寄养在泸州保姆家的四妹发电报。此刻却不敢叫在上海亲戚家的大姐回来，因她是被爸爸单位的造反派赶走的。我和小妹妹就在单位门里守着爸爸的遗体，楼上那些打手气势汹汹地威胁我们，说再不抬走就丢进河里喂鱼，说完还哈哈大笑。我们怒视着这群丧尽天良的东西，什么也说不出。下半夜，妈妈和二姐才回来，二姐告诉我，她下午去爸爸单位时，那些凶手不但不让打电话，还围攻她，她还想争辩，那些家伙恶狠狠地说“就是要武斗”，差点打了她。她赶紧拿走爸爸的提包和一只打断了带子的手表，另一只鞋子也没找到。

第二天是“五一”节，往年这时，我早与同学们上街游行欢庆了，而此时我们却围着爸爸冰冷的遗体哀泣，还不断有人来喝骂我们。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

爸爸的遗体就要被强行火化了。一个老工人给爸爸换上干净的衣服。后听妈妈讲爸爸浑身上下没有一点血迹外伤，全是大块大块青、紫、黑的内出血伤痕，惨不忍睹，连那个换衣服的老工人的手也在发抖。写到这里，我的心也在颤抖：

爸爸呀，你没有倒在旧中国敌人的刀枪之下，却惨死在今天，这究竟是因为什么？为什么？！眼看着那具死红色的棺材被拉走，我真想扑上去砸开它，救出亲爱的爸爸，我实在不愿相信眼前的事实！

爸爸的骨灰，他们只许买一个廉价的盒子装，还不许放到殡仪馆。火葬场一位老工人同情我们，让我们暂时存放他那里。爸爸忠心耿耿为党工作几十年，最后竟连个葬身之地也没有，问天下公理何在？！

爸爸永远离开我们了，我们时刻都在想念他。生活中，他既是我们的好父亲，又是我们的好老师。我们怎么能够没有他？

在我永远的记忆中，爸爸是个性格温和，热情开朗的人，他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永恒的微笑，同人讲话轻言细语，很有修养。不知道的人会以为他是知识分子出身，其实听妈妈讲，他上学不多，全凭自学。

爸爸酷爱看书，在家里常见他捧着书看，他读过的书，从政治历史到文学作品，上面都有他划的杠杠，写的批注等。

我们姐妹五个从小最喜欢爸爸，他一有空就给我们买书，念书，买文具，看电影。我10岁时，爸爸就鼓励我看革命小说。爸爸教育我们要诚实，有次上街散步，我和妹妹在路边拾到一个大广柑，当时就想分吃，爸爸耐心地对我们说：拾到东西应当归还，这可能是运输车上掉下的。随即让我们交给街心站岗的民警叔叔。爸爸还教育我们要尊敬师长，对人要有礼貌，并注意言传身教。记得小时候，我们家保姆的农村亲戚来，他都同他们摆谈一阵，一起吃饭。他还对保姆说：你有什么意见尽管提出来，我们是共产党人。当保姆的老伴——一个老工人，听到爸爸惨死，气得捶胸顿足，痛呼上苍！

爸爸的许多言行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次爸爸带我看电影《三进山城》，看到其中那位八路军连长将手榴弹捆在汉奸的腰上，他同时拉着引线和汉奸的手，以防其乱说乱动时，我不明白，回来的路上问爸爸：“万一手榴弹拉响，连长也会牺牲，多划不来呀。”爸爸严肃地对我说：“敌人是怕死的，而共产党员不怕死！”爸爸这声音至今仿佛还回响在我耳边，我由此想象，爸爸在惨绝人寰的毒打下，该是以这种气概忍受的吧！

爸爸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从不计较个人得失。饥荒年时期，爸爸曾被定成所谓“右倾”下放到农村两年，记得暑假爸爸带我去过那里，我亲眼看到爸爸的工作，他白天参加生产劳动，晚上和人们在灯下开会。虽然住的是茅草房，点的是煤油灯，但爸爸总是很乐观的。可记得有一次，那是一个天空阴郁的日子，爸爸拉着我的手匆匆走着，走过田野，穿过一片树林，他突然站住了，我十分惊喜地看到，眼前是一大片洁白的荷花，尽在微风中摇曳。爸爸仍然什么也没说，在荷塘边伫立良久，才牵着我慢慢回走。这一幕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现在想来，

爸爸也许是自己敢于说真话而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苦苦思索、冷静剖析吧。他是去寻找那“出污泥而不染”的榜样啊！

我第一次走进爸爸的办公室，看到墙上有一副对联：横眉冷对千夫指 俯首甘为孺子牛。爸爸正是以“孺子牛”的精神鞭策自己为党工作的。

文革一开始，爸爸就认真地学习响应，他支持我们出去串联，说让我们锻炼，我们当时幼稚无知，狂热地投入这场所谓革命。后来社会上分了派，我们家也分了派，有次二姐和大姐“辩论”，说什么“刘张就是受害者”，爸爸在旁边听了耐心地说，你们红卫兵革命不是为刘张两个人，你们年龄小，有些事你们不知道。又有一次二姐说“武装支泸大方向是正确的”。爸爸耐心地说，怎么能用枪炮打阶级弟兄呢。爸爸虽然见我们这样胡闹，却从不生气，总是耐心而温和地对待我们。而我们当时有一种今天想来不可思议的狂热劲，反而觉得爸爸跟不上形势。那是多么荒唐愚昧的年代啊！

1967年宜宾武斗的前夕，爸爸非要去北京向中央反映问题。后听妈妈讲，劝他不要去，他坚决地说：为了革命，为了人民，一定要去。就这样毅然赴京。

爸爸从北京回来后，形势起了变化（后知他们在北京时已被扣留了），所谓“红十条”下来了。看得出爸爸脸上时有阴云，但仍不失乐观，每一条“最新指示”下来，他都认真地学习深思，他被罚做重体力劳动，还常被批斗挨打，却从没听见他有一句怨言。有次他回家时，白衣服上全是大墨字，脸上头上有血迹，妈妈问他，他只是淡淡地说，没什么，在墙上碰了几下。还有次他让妈妈帮他腰上贴膏药，妈妈问他怎么了，他仍然不经意地说，没什么，让手枪顶了一下。妈妈很生气，让他暂时回老家躲避，他不同意，说接受群众批判嘛，难免过火。那时，我跟着二姐经常在外“革命”，从没想到爸爸的处境，更没有分担爸爸的痛苦，现在想来真是后悔莫及，我将永远不会饶恕自己！

就在爸爸遇害前三天，宜宾成立革委会，他属“走资派”不能参加。但头一天晚上，他仍然很高兴地在油灯下（那晚停电）为我们烙饼，准备第二天的干粮，还满怀希望地说，成立革委会是毛主席的指示，好在我们家也有人参加。我和二姐则以为我们的所谓“观点”胜利了，更加得意，以为全家我们最造反，最革命，最最忠于毛主席。现在想来真是一场噩梦！

爸爸的血，洗亮了我们幼稚的眼睛，我恨透了那些灭绝人性的刽子手，恨透了煽动这场祸国殃民运动的阴谋家。我平时连杀鸡都不敢看，但倘若有一天将那些刽子手推到我面前，我的手会狠狠地复仇！我的爸爸太好了，他死得太惨了！

爸爸死后，他们没给一分钱，我们五姐妹的生活全靠妈妈一人负担，妈妈又常病倒在床，不久又去了“五七干校”。半年后两个姐姐下乡插队，全家生活十分困难，我和大妹妹就到十几里外去做小工，没钱乘车只好走路，顶风冒寒早出

晚归，把挣来的一点钱交给妈妈。那时我还不到十六岁，那些艰辛的日子我永远忘不了。后来我也去了农村插队。那些年，我经常梦见爸爸，尽是一些惨象，有次在乡下我哭醒了，把同伴也惊醒了……

那时候，虽然也有同情我们的好心人，但也只有偷偷安慰我们。我们只能将仇恨和伤痛压在心里。有次二姐说，我们混车到北京找总理吧，然而在那种阴霾的日子里，终于没去。

我常常借幻想安慰自己：爸爸在遭受毒刑的时候，曾经出现晴天霹雳，有本书上写过这种情景，结果二十年后果然报了仇。我祈祷着这一天。……

今天，祖国山欢水笑，人民安居乐业，我们更加怀念亲爱的爸爸。每一个善良的人，谁不想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谁不想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只可惜，万恶的“四人帮”毁灭了我们的幸福，毁灭了千万个家庭的幸福！写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爸爸那极其痛苦的遗容：他的眼半闭着，像是在对着苍天探询；他的嘴半张着，像是在无声地冤喊……

亲爱的爸爸，让我替你大声疾呼吧：善良的人们啊，千万要警惕，不要再受人愚弄！绝不能让这种野蛮残忍、任意杀戮的惨剧在我们国家重演！！

敬爱的父亲：您安息吧！

## 追思无尽

父亲被害的消息，一直没有告诉年迈的外公，外公每次来信都要向父亲问好。母亲为不引起老人疑心，还要从本来就十分拮据的生活费中寄几元钱给他。外公1972年7月给母亲的信中还在顺祝“嘉陵婿”安好。可怜的老人，直到1974年去世，都不知道他见面不多却非常喜欢的“嘉陵婿”早已不在人世。我们姐妹除大姐外，从没见过外公，父母繁忙的革命工作和清贫的经济生活，筑成一堵高墙将亲情隔断……

1972年7月，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上海作协编辑、作家左泥给母亲来信：

桂芬同志：

前天忽然听到加林（注：父亲曾用名）恶耗，惊讶悲痛万分。加林于我，真是人生难得知己了。全国解放，你们去了西南，十七年中，我和他虽仅有几十分钟的一次见面，此外就是偶有的几次通信和您来沪两次，知道一点情况。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那时候，彼此都以在为党工作相互勉励，即使数年不见一信，并不觉疏，远隔千山万水也不觉远。记得他最后给我的信是在1964年……

……这几年来，我常常想，加林是当权派，加上他的一些社会经历，运动中



很可能要受些冲击。但也深信，像他这样的革命品质和智慧，定会比较顺利地过这一关的。并且还在企望着将来有一天见见面，共同回忆这段经历，甚至还要作为乐事笑谈。哪里料到，我在想象这些的时候，他却早已不在人世了！如今遥望西南，眷念故人，往事历历，如在眼前，千言万语，再与谁说！迫害情形虽还毫无所知，但种种拟想，若隐若现，悲愤沉痛，无计排遣。……

文革运动中权力变更翻覆，一度得到中央信任、执掌四川大权的刘、张，1969年底被中央决定“下台”，王茂聚自杀。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更凸显文革的荒谬和失败。此后中国大地依然笼罩在阴霾之中，直到1976年9月，文革的发动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去世，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倒台，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这场政治运动才终于结束！

然而父亲已经看不到这一切！他宝贵的生命在那无谓的政治运动中被扼杀，过早地成为文革的殉葬品。

又经过两年多的拨乱反正，父亲的沉冤终于昭雪。1979年元月15日，中共宜宾地委为父亲举行了追悼大会。历经磨难的母亲终于熬到这一天！

追悼会上宣读的悼词，对父亲作了高度评价：

……他对党忠诚，光明磊落，襟怀坦白，廉洁奉公，从不计较个人恩怨和个人地位高低。他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同群众同甘共苦，及时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他作风民主，善于团结同志、团结群众，知人善任，多谋善断，出色地完成上级交与的部门领导工作。他坚持原则、实事求是，敢于抵制浮夸风和不符合实际的言行。他认真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为发展我区水电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深受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爱戴。

既然是“深受党的信任和人民群众的爱戴”的好干部，为什么在党领导的文革中，却成了一定要打倒的对象？被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新生红色政权”认定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被“革命群众”暴打致死？

远方的亲朋好友们无不为我父亲的遭遇叹息。上世纪80年代，他们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嘉陵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根重要的精神支柱，他的离去，虽然没使我们瘫下来，但我们的脊梁上却都像受了重重的一击！挺着，挺着，我们都挺下来了，可在我们之间，还是缺少了一个像嘉陵这样的核心。可惜啊，这样好的党员，这样好的人民的儿子，却是那样的不幸！要晓得深埋在他内心的光和热，显然还没

有发挥出百分之一啊！正当他日趋成熟，可以为党为人民作更多贡献的时候，却硬是被摧残致死了，多么令人费解？可我又觉得他没有死，他活在我的心里，活在很多人的心里……

……得知你家的不幸之事，亦感十分悲愤，“极左”路线给予我们这一代人的痛苦的教训实在太深了。……57年3月我被送去重庆北碚劳教，61年解除劳教后，回到无锡农村老家，二十多年来一直在家搞农业劳动，虽然生活苦一些，但好歹一家团聚在一起。现在也算熬出头了。我来到成都后，当年一起进军到川南的战友见到了我，都为我还在人世而感到庆幸。

当年新政之初，许多有志知识青年受革命激情的鼓动，舍弃东部优越环境，千里迢迢来到大西南工作，却在1957年纷纷被打成“右派”，劳改劳教、遣送农村老家。不幸中的万幸，他们从此脱离政坛纷争，再苦再累总算保住性命，和家人团聚。而朋友眼中颇有才华的我父亲却遭横死，令人唏嘘不已！

## 痛定思痛

今天，时代已发生巨变，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我们才摆脱了精神枷锁，结束半温半饱。随着社会思想解放，逐步认清了那并不遥远的历史，方能清醒、理性地探寻父亲的悲剧根源。

父亲年轻时因不满国民党搞独裁、腐败而选择跟随高倡民主的共产党，信仰共产主义，这是时代使然，无可厚非。他的悲剧源于：

### 1. 红教洗脑至深。

父亲对执政党满怀景仰，因为执政党总是举着一面面美好的旗帜，确实给社会带来新气象，加上“共产主义”的神话、“宇宙真理”式的宣传……父亲以为崭新的社会真的到来了，苦难的旧时代彻底结束了；父亲的才能也一度受到重用，因而绝对相信党，自觉接受其一切理论，思维不自觉地被桎梏。虽然他也曾有过理性的思考，但在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不断地被洗脑，使他宁愿迷信党而不相信常识，不相信自己。另一方面，党对于所谓“犯错误”的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有一整套的思想控制艺术，让他们下放劳动、“改造思想”，同时留有一丝“复活”的希望……因而他的思想和精神被牢牢控制，只能依靠党、逆来顺受跟党走。父亲在下放劳动时，还鼓励被划为“右派”的三叔“好好改造，争取‘摘帽’”。

### 2. 理想脱离实际。

父亲读了许多马列毛等政治书籍，做了许多笔记，他的政治理想具有浓厚的

书生气，脱离当时贫困落后的社会现实，显得卓尔不群。他力图将那些政治理论运用到工作和生活中，因而总是将一切问题往理想光明处看，不能正视政治生活中的阴暗面。父亲曾与四叔为现实问题争论，批评其“只看阴暗面”。

### 3. 受“斗争”谬论蛊惑。

父亲听信“阶级斗争”、“人民群众”、“阶级敌人”这一整套谬论，竭力追求所谓真理、坚持所谓原则，进而陷入可怕的政治斗争漩涡中，无所适从，不能自拔。他总是往好处去看待所谓“群众运动”，最终惨死在暴徒手中。

### 4. 天性不适官场。

父亲为人诚实坦荡，他的日记中全然没有隐晦、阴暗的文字。他不具备多副面孔，不会说假话，因此不能应对官场中的重重险恶，更不懂得世故圆滑、识时务来保护自己。

这一切主观和客观因素，最终铸成父亲的悲剧！而父亲至死都不明白他的理想和忠诚被欺骗和利用，更是悲剧中的悲剧！！父亲青年时代的挚友左泥先生对我说：“你父亲是个理想主义者，有能力也有智慧，但不幸被换了脑子”！这是时代的宿命。

父亲死于“文革群众运动”中与之无冤无仇的“革命群众”之手的惨剧。让我进一步反思：中国民众为什么会狂热地响应文革运动，进而形成“打、砸、抢、抄、抓、杀”的暴力血腥？究其原因，除了文革之前受到迷信领袖和政党的红色宣教熏陶之外，试分析还有以下因素：

1. 中共执政初期，长期战乱结束，社会出现新气象，颇得人心。但后来执政党的等级特权逐渐强化，引起下层老百姓日益不满，特别是到了因政策失误引起的大饥荒时期，更是为了维护党的形象而不顾民众死活……文革初期揭发出高官的种种特权生活内幕丑闻，大快人心，所以民众普遍拥护“打倒修正主义分子”、“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

2. 人群中总有一部分能力较强的人，天性倾向个人奋斗，而由于极左年代的极度专制且僵化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限制了这部分人的才能发挥，文革给他们提供了舞台。这类人（两派都有）企图借机改变自己的命运，在文革中叱咤风云，成为制造动乱的干将（而实质仍然是被利用）。

3. 在文革前多次整肃民众和干部的政治运动中，早有暴力血腥，人性已逐渐异化。没有法治人权而只有专制淫威的社会意识，成为文革暴力的土壤，即所谓文革的群众基础。始作俑者诱出人性的魔鬼，教唆人整人、互相揭发、六亲不认，把人变成魔鬼，使其冷漠、残暴、血腥在文革中达到极致。

有网友说得好：集权专制下没有公民，所谓“群众”，只能是愚民、奴才、暴民。

文革的本质就是反人类，极左意识形态将国人的人性扭曲、异化。文革浩劫不仅夺去了千百万无辜者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基本道德文化：黑白可以颠倒，小人公然当道，忠诚老实者倒霉，虚伪奸猾者得利……

短暂的拨乱反正并没有彻底清算文革恶果，更没有引起全社会的深刻反思。经历文革的许多人则“看穿了，搞懂了”，从盲目迷信领袖政党而转向只信金钱的极端，且此社会意识已遗祸后代。如今社会的道德下滑、诚信缺失、大小贪腐、上下造假……归根到底无不与文革有关！

文革遗风并未完全消失，极左年代的流毒种种仍然侵蚀着我们民族的肌体：不良政治权力争斗及民众的人治思维皆在延续！由于文革真相长期被掩盖、淡化，后来者对此一知半解或全无所知，因此，类文革的发生不是没有可能！

真诚告诫善良的人们：随时保持头脑清醒，坚持独立思考，谨防一切欺骗愚弄和利用。珍惜生命，坚守良知，回归常识，努力建立公民社会，避免悲剧重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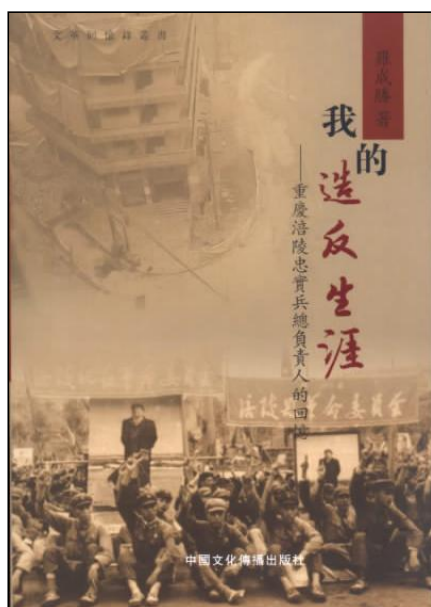
---

【书海泛舟】

## 写出自己的真历史与真思考

### ——罗成胜回忆录序

《昨天》编者按：罗成胜著《我的造反生涯——重庆涪陵忠实兵总负责人的回忆》，（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第一版已于2015年10月面世。



何 蜀

罗成胜的这部回忆录，有四个特点，使我——或许也会使其他一些读者——很感兴趣：第一点，是他在文革中的特殊身份。

近年来，撰写或口述个人回忆录的文革亲历者逐渐多起来，但是，其中很少有（在我有限的了解范围内还没有看到）一个是像罗成胜这样：先是文革初期的官办保守派红卫兵的筹建人和实际负责人，后来却成了造反派红卫兵的负责人。当时各地的官办保守派组织，除去个别边疆地区的因得到军区支持而屹立不倒一直与造反派抗衡外，几

乎都在 1966 年底、1967 年初看到中央明确支持造反派的态度后土崩瓦解，其负责人除个别的“反戈一击”参加造反外，大多退出文革舞台成为冷眼旁观的“逍遥派”，即使参加造反的，也很难成为造反派中的负责人。而罗成胜却成了涪陵地区造反派红卫兵的总负责人，并以此身份进入了“新生红色政权”地区革命委员会担任常委。也因此，他两度成了“无产阶级专政”的阶下囚。这是其他官办保守派组织负责人很难享有的“殊荣”。（右图：罗成胜近照。）



第二个特点，是他所写到的涪陵文革。

当时涪陵是四川省的一个专区（现在划归了重庆直辖市），可以说是四川文革中的一个热点地区和重灾区。由于以毛泽东为首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在“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旗帜下挑动群众斗群众，挑动军队斗群众（命令军队“支左”，即只支持群众中的“左派”），涪陵的民众被分裂成了严重对立、你死我活的两大派（当然都自认为是左派），其中一派（即罗成胜担任红卫兵总负责人的“忠实”派），在 1967 年 5 月中央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红十条”下达后，被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认定为“革命左派”，并在毛泽东“武装左派”的指示下经中央批准由成都军区发枪武装，另一派“红卫”（红联司）派在败退撤离时对俘虏及所谓“黑五类”进行的大屠杀，在四川文革史上留下了血腥的一页。涪陵地区一时间成了得到上级批准的“左派”一派掌权的“红色根据地”。然而因高层矛盾引起的政局变化，曾经被成都军区明文定性为“保守组织”的涪陵“红卫”派又被中央宣布为革命群众组织，虽然组织已经不复存在，其代表人物仍被找出来“补台”进入革命委员会……对于“支左”部队在当地文革中所起的作用，部队与造反派的关系，部队在两大派武斗中的作为，部队到底是不是在“支持左派”稳定局势时开展了“剿匪运动”……这些都是当年就有激烈争论，如今仍然得到许多人关注的问题，罗成胜在回忆录里都有详细的记叙、分析、考订和反思。

这部回忆录的第三个特点，也是其突出的亮点，是贯穿始终的反思精神。

原造反派人士所写的回忆录或口述史，大多有这样几种情况：有的能比较客观地叙述个人经历，但很少从思想上对那些经历进行重新思考或深刻反思；有的还在津津乐道于当年的“叱咤风云”、“粪土王侯”，而对另一些经历则采取“选择性遗忘”的态度；有的主要立足于为自己辩护，整个回忆录就像是一个长篇辩护书；还有的则竭力打扮自己，文过饰非，甚至虚构编造，就更不值一提了。

而罗成胜的回忆录，始终在叙述史实的同时进行着严肃认真的反思，用他的话说就是进行“真思考”，“真思索”，以写出“真历史”。他不仅对自己所经历的有关史实都重新进行考订，分析，而且让自己站在新的高度去重新认识，就像原清华大学孙怒涛的回忆录书名说的，对自己进行“良知的拷问”。

第四个显著的特点，是其他许多回忆录都没有的，即对互联网的充分运用。

文革回忆录的作者们普遍年纪较大（当年的中学生现在也都年近古稀了），他们当中能使用电脑写作和上网交流的很少，而罗成胜在写作回忆录期间就已经开设了个人博客，将写成的回忆录初稿一篇篇放到网上，听取网友意见。他还上网查阅了大量相关史料，搜索网上其他人对涪陵文革有关史实的记叙，并加以对比、分析，与网友进行一些探讨、争鸣，这些网上互动的成果，在他的回忆录中随处可见，书中还不时能看到有关网上资料出处的链接网址，使本书在文革亲历者回忆录中别具一格。

此外，罗成胜坚持将他的这个回忆录命名为《我的造反生涯》也很有意思。不少好心的朋友曾劝他将这个回忆录的名称改一改，因为在官方的“彻底否定”和“清理三种人”等强力宣传之后，“造反”已经成为人们避之唯恐不及的贬义词了。而他坚决不改。按他自己的记叙，在他四十五岁（即1991年涪陵县法院正式向他宣判无罪）之前，他有两次造反，即文革前在涪陵高级中学读高中时，因反对学校党支部诬陷他的同学，于是他打抱不平拍案而起的第一次造反，以及文化大革命响应“伟大领袖”“造反有理”的“伟大号召”而进行的第二次造反。第一次不到两个小时的造反结局是，他这个学习成绩优异的工人后代（政治表现也好，初中是涪陵五中学生会主席，高中是学校学生会宣传部长），竟然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高考中（1965年）因为“政审”不合格而落榜；他文革中的第二次造反的结局就更为悲剧了——两次坐牢，第二次坐牢后还被戴上“反革命分子帽子”监督劳动，管制三年。难怪他在他的这个回忆录的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一个不受制衡的权力体制中，任何专制的统治者在骨子里原本就不能容忍造反！都说‘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败’，我还认为，‘绝对的权力，绝对的反造反！’”他的这个反思或许对有些人，特别是和他一样曾经的造反派头头反思文革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与罗成胜兄的相识，得益于几年前参与重庆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做文革亲历者口述的工作。

从2011年7月开始，由当时分管文史工作的重庆市政协副主席吴家农提议促成，重庆市政协学习及文史委员会开展了一项抢救历史活资料的工作：与重庆市图书馆合作录制文革亲历者的口述。我应邀参与其间，做一些寻找、联系口述者，帮助提供资料，在口述现场采访提问或作提示性引导，事后整理口述文字等

工作。这一口述录制工作整整进行了两年，共录制了文革时期的造反派、保守派、“走资派”、“支左”军人、“黑五类”子女、劳改营“右派”、反文革的政治犯等各方面人士 147 人的口述。当口述工作扩展到文革时还属于四川省的涪陵、万县地区时，涪陵地区政协请到了当年涪陵地区的风云人物罗成胜。

2012 年 12 月 25 日上午，录制罗成胜口述的工作开始前，我才与他第一次见面。他见到我后，很坦率地说：“你那个武斗大事记上有关涪陵的记载太片面……”我也坦诚告之：我当时手里没有资料，只有一份“红卫”派的小报，而且，我编写的那个大事记，并没有打算上网，也不是定稿，是我发给几个朋友征求意见的，不知被谁传出去，以后又不知被谁放到了网上……

就这样，我们一见如故，成了思想相通的朋友。

在罗成胜的口述录制中，我发现他与我接触到的其他许多造反派人士不同，他很有思想，对当年亲历的那些史实进行了很严肃的重新了解，重新审视，有深刻的反思，这是很难得的。因此我建议他把自己的回忆录写出来，留下一份有价值的亲历史料。这时，我欣喜地知道他已经在写了。此后，我就陆续读到了他发来的回忆录初稿片断，并进行了一些意见交流。

现在，罗成胜这部厚重的回忆录终于跟读者见面了。希望关心那段历史的读者都能读一读，也希望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们能像罗成胜这样写下自己的亲历与反思。

2015 年 4 月 19 日于重庆风江阁

---

【书海泛舟】

## 疯狂的报复

（《我的造反生涯》选读）

罗成胜

《昨天》编者按：本篇节选自罗成胜著《我的造反生涯》一书第五章“疯狂的涪陵大武斗”第 16、17、19 节，现标题是另拟的。

四川省涪陵地区的群众组织在文革前期分裂成为“红卫派”与“忠实派”两大派。1967 年 2、3 月的“镇反”运动中，“忠实派”被军分区打成“反革命”镇压下去，“红卫派”一派独大。5 月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红十条”和 6 月成都军区的“涪陵五条”相继下达后，军分区转而奉命支持“忠实派”，在随后爆发的大规模武斗中，驻军支左领导小组按上级命令支持并武装“忠实派”，将“红

贸派”赶出涪陵城，随后又进行追击，直至“红贸派”在强大压力下溃败。涪陵又变成“忠实派”一派掌权。本刊节选的这部分内容主要记叙了两派在武斗中相互进行疯狂报复的情况和作者的反思。

### “红贸派”溃败之后

在“我所知道的李畔政委”一节中，我说过：“虽然用这种‘赶鸭子的方式’将‘贸派’‘赶垮’对于‘贸派’这个组织来说，是一件让‘贸派’广大的组织成员无法接受（当然，现在看来这种作法首先也是不公正的，因而也不具备正义性），但真正的血腥，就连‘贸派’的群众也清楚，那是当组织垮掉之后的‘贸派’人员落入以‘胜利者’自居的‘忠实派’手中之后”。

下面就我所知，我将记录下在“红贸派”溃败之后所发生的悲剧。

其实，对于“红贸派”的参加者来说，悲剧的发生从1967年8月15日“红贸派”被赶出涪陵城，“忠实派”全部控制涪陵城的时候就开始了。

就在“红贸派”被赶出涪陵城前后（特别是之后），“红贸派”已有不少的成员“反戈”。于是就很自然地出现一个如何正确对待所谓的“受蒙蔽群众”（即“红贸派”“反戈人员”）的问题，因为“忠实派”中的所谓造反派、特别是“忠实派”中的红卫兵即“忠实兵”已经有人开始违反政策，打骂虐待“红贸派”“反戈人员”。

作为当时主持涪陵政务的最高当局——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首长，很快就对此引起重视。

我至今都还记得，支左领导小组组长黄鹤寿政委和副组长李畔政委在“八一四”之后就明确对我说，要我哪里也不要到（指不要到“前线”），就在城内管好“忠实兵”，制止“忠实兵”中可能发生的违法乱纪的事。

为此，就在“红贸派”被赶出涪陵城的当天，1967年8月15日，“忠实兵司令部”（全称是“毛主席最忠实的红卫兵涪陵革命造反司令部”）和“川涪总司”（全称是“四川涪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发布“联合通令”。该“通令”第一条即称：“一切受蒙蔽的人，只要放下武器，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我们热情欢迎。我司令部所属各战团及任何个人，均不得随意抓人，更不能任意打人。违者将给以纪律处分，严重者将依法追究责任。”（见“忠实兵战报”第九期）

紧接着，1967年8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又发布《紧急公告》，该公告第四条即称：“涪陵地区无产阶级革命派要牢记毛主席关于‘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的伟大教导。要有胆略，有气魄解放受蒙蔽的群众……对受蒙蔽的阶级兄弟，要进行耐心、深入、细



致的思想工作，争取、教育、团结他们。热情的欢迎他们起来造反，欢迎他们回到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来，在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大联合的基础上，逐步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见“忠实兵战报”第九期）

实话实说，那段时间，我几乎成了个“消防队员”。我经常带着几个人（当然都带有武器）到学校（包括我的涪陵一中）去检查有没有乱抓乱打人的情况；只要有人来报告（“忠实兵司令部”在涪陵城中山路北门口对面的老商会内）哪里有打人的事，我就立即带人去制止；虽然能够起些作用，但我人一走又开始打的事还是时有发生。

总之，违法乱纪的事仍然不断发生，特别是“红卫派”彻底溃败之后（即1967年9月底10月初）。

例如，我们学校（涪陵一中）的石仕荣老师（女）10月初从栗子寨回来后就被打得很惨；我们学校（涪陵一中）的柯祥云同学（后进了中央歌舞团，前几年病逝）从栗子寨回来后也被打得很惨；甚至发生有“忠实兵”搞恶作剧，把他们认为“最可恶的人”弄出去“假枪毙”（如对“红卫总部”的赵××）——此事文革后仍一直被有关部门追查。

这里我说说两个人亲身经历的事。

一个是我的朋友的爱人汤××，她当时是“红卫派”的红卫兵，在黄沙坝被“俘虏”押回涪陵，他们学校（涪陵五中）的所有20多个女生被集中在一起“学习、转弯”。一天上午，在涪陵“六一九”武斗中第一个被“红卫派”打死的涪陵五中学生胡××的妈妈来了，她把这20多个女生一个一个叫起来（原本她们围坐成一圈），喊一个起来就给一个耳光，这位妈妈一连打了20多个女孩的耳光后才骂咧咧地走了——其实这20多个女生没有一个与她儿子的死有关，只是“观点”不同，又和她死去的儿子是一个学校而已……

更有甚者。我在前面几次提到的原涪陵体委退休游泳教练余肇森，给我讲了一个更悲惨的事。

原涪陵军分区所辖独立营926部队张××（人称“张班长”），因为支持“红卫派”并离队随“红卫派”上了栗子寨。也是在黄沙坝被“俘虏”，在押回涪陵的当天即被人抓走，被打了很久，被打昏多少次他自己已经记不清。当他被他的部队战友抬回部队时已经生命垂危。凭着他年轻的生命力（当时他只有20多岁），经过两个多月的治疗“他捡了一条命”（余肇森语）。但从此身体就垮了下来，经常全身疼痛，40多岁（从部队退伍后安排到涪陵海陵厂）就死了，死的时候人早就瘫痪了。

由于余肇森先生文革前就和“张班长”很要好，而余又是“忠实派”的，所以“张班长”在部队治疗的那段时间里余经常悄悄怀揣酒肉去看“张班长”。有

一次，“张班长”给余肇森讲了他被“俘虏”前的事，他说：“在黄沙坝我们被包围后，有几十个‘忠实兵’冲上来，我当时要是狠心，凭我手中的冲锋枪，这几十个红卫兵都要被我撂倒，但我忍了，结果我被俘虏了，还被打得这么惨。”

这肯定应该是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忠实派”中一些人的胡作非为，“红贸派”的一些“反戈人员”被迫跑到重庆；加上重庆“八一五”的支持，所以“红贸派”不久又在重庆重新恢复组织，并最终坚持到1969年12月25日中央新的批示下达；从而迫使作为当时四川的最高当局成都军区推翻1967年6月17日由它发出的“涪陵五条”，承认“红贸派”是革命组织。这是后话，容我后面细说。

我常常有这样一个想法：在中国大陆，现在年纪在60岁以上，而且在过去60年里命运坎坷的老人中，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不管他参加没参加所谓的造反派组织，也无论他是哪一派的观点——无疑是他们多舛命运中最悲惨、最不堪回首的。

下面我将记录的这个人当年的悲惨遭遇就可以证明我以上的判断。

他叫李堂皇（征得他本人允许用他的真名），当本书付印时已经是年过八十了。

生于现在的重庆秀山县的他，在共和国成立不久（1950年）就“参加革命”——17岁的他因为家庭无力供养就读秀山中学而被人指点，进入“读书不要钱”的“干训班”。三个月培训下来即安排进新生红色政权的酉阳专署（当时的酉阳专署只管辖酉阳、秀山、黔江三个县）。1952年秋酉阳专署与涪陵专署合并，于是他即到涪陵专署秘书室（办公室）工作，并于195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这期间他曾作缮写员、档案员、打字员、文牍干事及秘书工作。在他1961年调离专署前虽然一直都只是一个一般的公务员，但也可算是一个“老专署”了。

即便是没有官运的李堂皇，在1957年“反右”斗争中本来没有任何问题，却因为无中生有的被划成专署办公室“三人小集团”的头目而被下放到石柱县黄水农场（场部办公室）——当年被下放到黄水农场的干部不少。

即便是在黄水农场任劳任怨工作的李堂皇，也因不明不白的原因在1959年的“反右倾”（即批彭德怀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中被批判，甚至在“反右”两年后，在无任何材料的情况下无中生有地背上了“中右”的黑锅。

李堂皇在黄水农场和他的母亲很艰难地渡过了新中国里饿死人上千万的灾荒年（1959-1962年），因吃不饱而双腿水肿的李堂皇也去放过牛马、种过地。

1961年夏黄水农场撤销后，李堂皇又转到涪陵水磨滩农场（李渡）劳动改造，直至水磨滩农场撤销，1962年回到涪陵专署畜牧局，也差一点就响应党的号召下放回秀山老家。

总之，即便如此，所有这些苦难加起来也远不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悲

惨。

1966年10月底至11月初，已在涪陵专区商业局业务科工作的李堂皇，因开会出差成都、重庆，看到成渝两地造反派早已起来造“走资派”的反，因而被激发出响应毛主席“造反有理”伟大号召的革命热情，回涪陵后最先在涪陵专区商业局内与几个有相同观点的人一道写出造反大字报，揭露涪陵地委在1960年-1962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违背党中央的政策，导致涪陵地区大量的违法乱纪、吊打农民、饿死人的现象发生等，并一道组织成立了涪陵专区商业局内的第一个造反派组织“红贸军暴烈战斗队”——这也是我在前面的文字里，在谈到1967年2月8日之前的涪陵造反群众组织的组成情况时，我是将“红贸军总部”（一般都简称“红贸总部”）划在涪陵造反群众组织之中的直接原因。

从此李堂皇就开始了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悲惨命运。

由于行文的原因，在此我不打算去赘述他在1967年的“二月镇反”中（他所在的那派是军分区支持的，是镇压“忠实派”的）因不满他们那派在军分区的支持下乱抓乱捕的做法而被视为“叛徒”“内奸”，差一点就被自己这一派抓进监狱的情况；我也不打算赘述他因不满成都军区下达的“涪陵五条”将他们这一派打成保守组织，因而在到成都告状期间被“忠实派”抓住而惨遭毒打的悲情；我更不想去赘述他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里，在涪陵武斗结束之后若干年中的多次所谓“运动”中挨整的命运；在此，我只想记录下这位被他的对立派，即“忠实派”视为“贸派的铁杆老保、八大金刚”的李堂皇先生，在他的组织“红贸派”溃败而落入“忠实派”手中的悲惨遭遇。

1967年9月底，“红贸派”最终于栗子寨溃败。李堂皇被作为“俘虏”押回涪陵，后被捆绑关押在当时的南门山高干招待所一楼的楼梯间。

在捆绑关押过程中所遭受的苦痛似乎还可忍受。最叫人无法忍受的是与涪陵一中学生柯祥云一起被批斗时所受到的酷刑。

那次批斗是五花大绑自不消说，而最不堪忍受的用电线将人捆绑得扎扎实实——那可是越动越紧的啊！被捆得肿大的双手臂由开始的红色变为乌黑色，双手指至今几十年仍然麻木！

批斗时自然是被勒令跪下（先是跪课桌，然后在课桌上加凳子，人跪在凳子上），让他至今不堪回首的是在批斗的过程中，因所谓态度不如批判者的意而被人在背后猛然推下，被反绑着的他从高高的板凳上重重地摔在硬硬的水泥地板上！

这还不算，批斗者竟然对摔在水泥地板上而差不多已经失去知觉的李堂皇施加了最不堪忍受的加刑——由于被反绑着的他扑倒在地而无法按批斗者的呵斥爬起来时，竟有人在他的脚后跟上加上一块长木板，两个人站在木板上踩！在那

一时刻，踝关节被撕裂的钻心疼痛使他不得不极度痛苦地干嚎，身不由己用自己的头和上身在硬硬的水泥地板上撞击以减轻痛苦！正是这种毫无人性的酷刑，使李堂皇先生的脚早已变形，至今仍可看到当年那罪行留下的印迹。

此外，至今让李堂皇先生回忆起来就万分难受的还有一个情节，即在批斗会场上遭受了各种酷刑之后，在押回关押的囚室时仍然是被五花大绑，最难受的是押他的人还在一路上推打，由于几个小时跪斗折磨，双脚早已红肿而不能走路，但押解他的人却要故意骂他不快走而在下楼梯时用力推，疼痛不堪的他只得忍着剧烈的疼痛冲下楼梯，为保证身体的平衡不至于摔倒（他知道如果摔倒将很难爬起来），不得不用自己的胸膛去撞击楼梯间的墙，就这样几楼下来回到囚室，全身所有的肢体都似乎不再属于自己而像要散架一般，钻心的疼痛使他根本无法平躺着睡觉，几十年过去了至今胸膛稍稍用力碰碰也疼痛异常……

……

都是肉长的人心使我无法再写下去，而对人应有的人格的尊严却使我对这些非人的暴行无法容忍，然而你一定不会想到，这些所有的非人性的酷刑都是只有十几岁的学生干的！

那是一个什么年代？中国人啊，你是怎么过来的？

由于无法忍受这些非人的折磨，使他在被释放后不得不和许多同样命运的人逃离涪陵到重庆，直至在经受了两年痛苦的颠沛流离之后，“红卫派”被重新认定为所谓的革命组织。

所幸的是命运多舛的李堂皇先生，凭着人的顽强生命力活了下来。晚年的李堂皇先生虽经摧残而身体多有不妥，但他生性乐观，坚持锻炼，家庭美满，加之过去对他的那些不公正待遇也因“落实政策”而予以纠正，所以也活得有滋有味。他对当年向他施以酷刑的小青年早已没有私恨，他唯一想要表达愿望就是希望人们记取那段悲惨历史的教训，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

作为当年对李堂皇先生施加暴行的这一派头目之一，我为我没能制止住这些暴行而内疚，并从内心深处向李堂皇先生及所有在“红卫派”溃败后，遭受非人性打击的受害者表示我深深的忏悔。

### 鲜为人知的涪陵文革大屠杀

重庆（原四川）涪陵清溪大屠杀（见作者墨蠓发表于网络的《艰难的历程（一百二十四、一百二十五、一百二十六）人对人为啥要如此惨绝人寰？》，在1967年8月初到9月中旬的近50天里，在涪陵县清溪区查实有二百八十一具被害人的尸体，在这二百八十一名被害人中，男性二百四十九人，占被害总人数百分之

八十九，女被害者三十二人，占被害总人数百分之十一；对立派即“忠实派”九十四人，占被害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三；一般群众九十七人，占被害总人数百分之三十五；当时所谓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五十一人，占被杀总人数百分之十八；无名尸体三十九具，占被害总人数百分之十四。

从墨螭写的前后几篇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四十多年前，作者墨螭作为涪陵清溪大屠杀的现场调查人（也是最早发现这一惨案并立即用书面报告给当时的涪陵地区支左领导小组的那个书面报告的起草人），因而是有相当的可信度的。

然而，可能是限于资料方面的原因，他只是写了当时涪陵大屠杀中一个区的情况（当然也是最厉害的一个区）。

虽然在他的《艰难的历程（一百二十五）》的“资料五”（直接指挥策划批准杀了三十九人的涪陵县清溪区代理区武装部长吴家治——文革后期判刑死缓，后减刑，坐二十年牢后释放回家——的供词）里，提到“我（吴家治）和平安（注：当时属涪陵县清溪区下辖的一个公社）陈邦立、区供销社刘永禄参加过赵树金匪首主持召开的焦石会议。我又亲自主持召开过清溪、焦石两个区和公社‘贸派’头头会议，传达赵树金的指示，布置‘三镇压’。”由此可以使我们将发生在当时涪陵县清溪区的大屠杀与赵树金在1967年8月15日撤到涪陵江东后先后七次正式开会研究杀人从而酿成涪陵大屠杀的悲剧联系起来，但作者墨螭却没有再写下去，因此使人们对发生在1967年8、9月的涪陵大屠杀缺乏整体的了解；而且，据我所查，目前还没有人对涪陵大屠杀的整体情况做过揭露；正因为如此，我才使用了这样一个标题：“鲜为人知的涪陵文革大屠杀”。

对于涪陵这段最血腥的历史事实，几十年后才得以通过互联网而披露于世（在这一点上我们首先应当感谢墨螭先生），这对于经过那场劫难而活下来的幸存者来说，总算是尽了一份历史的责任；也算是对那些无辜死去、特别是对其中那些被极其残酷的手段夺走生命的人们的一种告慰。现在是应该结束这种对历史不负责任的遗忘的时候了，健忘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

如果说作者墨螭所引资料源于经包括他本人在内的很多人的实地调查，因而具有相当的可信度的话（遗憾的是由于这些可贵的资料经“忠实兵战报”一转载，其中自然要加进去的派性语言使该历史资料失去了应有的中性表述，在一定程度上有损该历史资料本身的价值），我下面所引资料则应更具可信度。因为我手头拥有的是当时的审讯记录（主持审讯的均是当年公检法的司法人员，而且以后包括赵树金、况道成等人的判刑均将这些审讯记录作为重要依据）。据这些审讯记录载，从1967年8月15日撤到涪陵江东后，“红贸派”先后七次在正式的“常委会”上研究了杀人问题。在所有这些由红联司“常委会”正式研究决定杀害的90人名单中，赵树金自己承认亲自打圈以示批准的共33人（这也是最后给他定

罪判刑认定的人数)。

下面是所有审讯记录中的一份。由于这份审讯记录是当时“红贸派”的保卫科负责人的交待，而每次要杀的人均是由保卫科根据他们自己的“审讯”情况研究后提出要杀的名单，然后再报红联司赵树金等“常委”最后批准，所以这份审讯记录比其他人的交待要更系统些。这位当时“正牌的”“红贸派”的保卫科实际负责人李××（兼管保卫科所辖的专门负责审讯事项的政工组，后被判刑 20 年）是这样交待的：

第一次杀人，当时保卫科住在焦石粮站。1967 年 8 月 19 日上午，保卫科王××【据王志强交待：“我是联司的常委，名义上宣布我是保卫科的主要负责人，而实际上由于我不是正牌的‘贸派’组织（笔者注：因为他只是一个工厂的‘贸派’组织负责人，而所谓‘正牌的’应是商业系统的‘贸派’组织）他们有些排斥我，保卫科的实际负责人是李××。”】对我说：“联司喊把关押的人的材料弄出来拿去研究。”我就叫刘××通知保卫科全体人员开会研究，当时到会的有我，王××、刘××、李××、刘××、赵××、张××七人，会议是由我主持，当时我说：“联司叫我们整材料去批。”接着就由保卫科人员介绍审讯情况，被抓的冯国民案是我办的，我就介绍说：“冯国民是政法公社马泽林派来的奸细，这个人应报上去处理。”李××就介绍被抓的周伟的情况说，“周伟是焦石砸派（造反派）的头头，他组织一百多人，企图搞垮我们红联司。”其他几个人也介绍了一些审讯情况，详细情况记不清楚了，结果我和王××及保卫科全体人员都同意把 10 几个人报去联司批准处理，后我就把这 10 几个名单和材料交王××带去联司批，王××就把材料拿去联司找赵树金批的，结果赵树金在名单上划了 10 个人的圈圈，表示要杀掉。这 10 个人是冯国民、周伟、贺伦芳（专区医院医生，“12·31 红色卫生”反戈的）、马文渊（川剧团，红旗总部反戈的）、张本祥（石油公司的造反派）、张承歧（川剧团，红旗总部反戈的）、冉崇明（海陵厂工人，造反派负责人）、郑友明（藺市的石工，造反派战士）冉崇义、熊朝富（港务局工人，造反派战士）。

当天晚上由保卫科警卫排熊××等人把这 10 人提出来捆起，由况道成、王××带领保卫科的林××、杨××、余××、郑××等人用卡车把这 10 个人送到焦石出去悦来的公路三道拐处，由况道成、杨明仕（赵树金三个警卫员中最贴身的一个）、林××三人提枪打死的，打死后又把尸体推下岩脚去了，其中冯国民受伤未死，后逃跑了。这次因为我正在审讯一个被抓的造反派战士，所以未去参加提枪打人。

第二次杀人，是 1967 年 8 月底（具体时间记不清楚），王××对我说：“联司往包鸾转移，联司的意见要把关押的这些人材料报上去，要放的，要处理的都

在这边（指焦石）解决。”当天我就通知王××、刘××、李××、赵××、刘××、田××、兰××、张××和“红焦司”（焦石区的“贸派”组织）的一个人共同在焦石区公所研究，这次研究要处理的人多数是当地造反派，从涪陵抓去的只有“忠实兵”彭福胜（涪陵一中学生）。这次研究多是由“红焦司”的人介绍情况，结果我们大家一致意见是认为问题大而情况不清楚应带走 30 多人，问题已经清楚应杀掉 10 多个，应放走的 5 个，我征求大家没意见后，由王××拿去联司找况道成、彭用吉批的、联司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要杀掉 12 人，这 12 人有彭福胜（涪陵“忠实兵”）、简居正（焦石医院医生）、赵崇坤（焦石医院医生）、况居良（焦石的）等。

结果在 9 月 2 日晚，我带领靳志勇、林××、李××、余××、丁××、张××等人把这十二个人捆起用卡车运到涪丰公路 48 公里一个硝洞边，由靳志勇一人提枪把这 12 个人打死在硝洞边，然后他们又把全部尸体推入硝洞里，避免群众发现，影响不好。

第三次杀人是在丰都县的包鸾区，9 月 3 日赵树金、王富国（红联司常委），带起警卫员来包鸾小学一带视察，当时我们保卫科、医院等都住在包鸾小学，赵树金就问我那些被抓来关起的人的情况，我就汇报说：“其他是没什么，就是有两个关的时候把捆的绳子解了，被我们打了一顿。”赵树金听后叫马上枪毙这两个人；王富国还把这两个人的名字记去了。这两个人听说有一个是丰都汇南小学副校长，叫什么名字记不清楚了。当天晚上由四兵团的政委张××来将这两人提走，由保卫科熊××、晏××、吴××押去亭子垭枪杀，杀后把尸体推入一个深洞，具体是哪个提枪打的我不知道。

第四次杀人仍是在包鸾，9 月 5 日红联司常委王富国和他的警卫员来保卫科对我说：“联司叫你们把已经审问了的这些人的名单拿去我们开常委会研究。”我就立即叫刘××把保卫科的人通知到包鸾小学后面一个山洞里开会研究，参加的人有我、刘××、张××、李××、刘××、赵××、田××、陈××。会议仍然由我主持，首先我叫负责审讯的介绍情况，接着刘××、李××和我都介绍了各人审讯的情况，李××就说：“勾长茂是搞策反的叛徒，应处理（即杀）。”结果我们都同意处理勾长茂（县公安局干部，原是我们这派反戈的）、王明华（专署办公室主任、支持造反派的干部）、盛朝阳（焦石人，也是我们派“红联司”反戈的）等 13 人，研究完后我把名单交给王富国带去联司批，第二天晚王富国的警卫员就通知我去联司，我就和刘××、熊××三人去王富国那里，王说：“联司常委研究决定了名单上打勾勾的 13 人都要处决。”当时我就说：“现在王××不在家，803 的人（即保卫科警卫排）有些我调不动怎么办？”王说：“你们把人捆好，汽车出发后我就打电话通知你，我们另找人去执行。”说完后我回到保

卫科，通知了保卫科李××、熊××、刘××、晏××、朱××、钟××、郑××等人把这 13 个人捆好等汽车，后我们把人押到包鸾街上上的车。四兵团政委张××组织二个班，由营长向××带来执行枪决，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也参加了的，我们保卫科的人与向营长带的两个班一同把这 13 个造反派战士押上汽车送到亭子坝一个深洞边枪杀的，记得当时还跑了一个盛朝扬，第二天被当地贸派组织抓住，由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等人枪杀在亭子坝。

第五次杀人是 9 月 8 日至 9 日，我去江东接家属去了，刘××就在家主持，保卫科的李××、赵××、张××、刘××等人研究处理 15 个。名单是刘××交给红联司常委罗××拿去找联司不知哪个批的，后不知什么原因没有立即枪决。9 月 9 日左右我从江东把家属接来后，红联司常委黄年福就给我说：“现在关押的人都不能放，要一船推，全部处决干掉，这些关的时间长，了解我们的情况，放出去对我们不利。”后我把这个情况告诉了罗××，罗当时不同意把关押的人全部干掉，并叫我回去把名单和材料拿去联司批。9 月 11 日，我就召集了保卫科的刘××、李××、张××、赵××、刘××、兰××、田××、陈××等人开会研究，这次王××也参加研究的，在会上我说：“联司黄年福叫把关的人要全部干掉，后来我向罗××汇报，罗叫我们研究一下，看哪些放，哪些处理（即杀），再把材料报联司批，现在我们大家研究一下。”接着由保卫科审讯人员介绍了审讯情况和处理意见，最后我和大家的意见，一致认为应放 30 几个，就处理（即杀）18 个。研究后由我和刘××、李××、刘××四人去联司找罗××，由罗××把名单交给赵树金、况道成、彭用吉等批准的，他们完全同意我们的处理意见，即放 30 几个，处决 18 人，这两次（加上前次未处理的 15 人）共批准杀掉 33 人。这 33 人我只记得有陈锡均（包鸾人）、代天成（京剧团演员，造反派战士）、其余的我记不起名字了。当天联司李××（重庆后字 242 部队文筹的）说：“你们把人捆好摆到亭子坝交兵团的人执行。”结果我回保卫科后，就叫大家作好准备，今晚要执行任务，保卫科的除值班的三班外，其他的王××、李××、刘××、刘××、林××、余××等全部人员都出动了，我们分两卡车把这 33 个人捆好押去亭子坝地方交给况道成、杨明仕、“红成”的朱×，“242 文筹”夏××等带起联司的直属排来执行。

这次是由况道成、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等人用刺刀一个个地捅死的。当时有些被刺一两刀后还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况道成等人又捅几刀后，这些就被刺死没有喊了。这 33 个人被刺死后，全部尸体都被推下旁边一个很深的洞子里，我也去拖了两个尸体丢下洞里的。

第六次杀人，是 1967 年 9 月 12 日晚在包鸾小学，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和另一个（不知名字）来保卫科说：“联司叫你们把关的人的名单材料送联司研



究，再处理一批。”我就通知王××、刘××、李××、张××、刘××、赵××、田××等人开会研究，当时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也参加研究的，当时大家一致同意王仁达（红贸派“继红军战斗团”负责人，涪陵一中初67级学生，反戈的红卫兵）和曹麻子（县工交反戈人员）等13人应处理并报上去呈批，当天由王××、林××两人去联司给况道成、彭用吉批的。联司仍然同意保卫科的意见，处决10个。9月13日我就带领保卫科人押留下来（未杀的）的10多个人，向栗子区撤退，王××就带领林××、余××、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等人将决定杀的这10人捆好押到包鸾大桥出去的老鹰岩，由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一人用枪打死的。

第七次杀人是1967年9月24日在栗子寨（注意：这是“红贸派”主力撤出栗子寨的头一天），罗××来保卫科，我就说：“我们关起这些人怎么办啊？”罗××说：“你们把关起这些人的名单送去联司研究解决。”我就召集保卫科的刘××、李××、刘××、田××、赵××开会研究，大家都同意把孙长发（栗子人）等10人处理（即杀）……经联司研究同意杀掉这10人，当晚就准备处决。但刘××、熊××等人不同意枪毙这10人中的一个“红联司”的连长，结果未杀这个人，其余9人被押出去枪杀了。

这样，根据这位“红贸派”保卫科的负责人交待，从1967年8月19日起，到1967年9月24日止，在赵树金、况道成等人的主持下，先后在涪陵焦石、丰都包鸾、丰都栗子寨等地，一共有组织地进行了七次集体屠杀；其中，第一次杀了10人，第二次杀了12人，第三次赵树金当场决定杀了2人，第四次杀了13人，第五次杀了33人（实际上是两次研究决定一次杀的），第六次杀了10人，第七次杀了9人，共计89人。这个总数没有加上1967年8月27日红联司攻占丰都高镇后枪毙的3人，也不包括红联司在退守丰都栗子山后，在栗子区杀的人（据赵树金自己交代，起码有两个“地主”分子被杀）。

特别应该受到谴责的是，在第五次的屠杀中，在赵树金的直接授意下，被杀的均是被用刺刀捅死的！而由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一人就捅杀了六人！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他们自己是怎样交待的。

先看看赵树金自己是怎么交待的：

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八日下午（前文李××交待是八月十九日）在焦石公社楼上开常委会后，保卫科王志强拿个名单来说，有些人要处理，请常委看看。

王富国接到这个名单说：杀了！彭用吉说，研究杀就是了。我同意。我记得周超群说，杀人权在最高人民法院。我说，现在是非常时期，还来得及请示最高人民法院？王富国看了交给我，我看后交给况道成，常委都看了，都没意见，只

有周超群没有表态（周是参加过 1959 年国庆十周年天安门阅兵的转业军人，因没有杀人劣迹，1969 年“红卫派”组织被重新承认而恢复后补台结合进地区革委会任常委）。我记得同意杀四个，后听说杀了 10 个。（当时）我就说找个背静的地方，走的人少的地方处理。

第二天上午，公社文书就与我说：“赵主任，红联司在这里杀人不好，群众害怕。”我说：“没听说杀人啦？（我之所以不说实话是怕影响扩大了对我们不利），我给他们讲讲。”下午我就对况道成、彭用吉说：杀人的事让公社文书知道了，群众害怕，今后不要在本地处理，弄远点。（笔者注：这就是前文李××交待的第一次杀人）

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打丰都高镇（赵树金亲自带队），朱××抓到一个妇女， he 说是川涪（“忠实派”）的，弄到高镇山上杀的。当时有很多人在山上看，我就问：那边怎么那么多人？朱××说是我们在枪毙人。但我没说好坏，内心还是该枪决，我说：枪决就枪决了嘛。

六七年八月二十七日打高镇下午三点钟时，红卫三个人捉到二个“忠实派”的人，我说到山上看俘虏去，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说我去，杨明仕一会就回来了。我问：这么快？杨明仕说枪决了，我也没说好坏，表示同意。（笔者注：打高镇杀的三人不在前文说的 89 人之内。）

六七年八月二十八日二点钟就离开高镇，走四天才回到丰都包鸾（“红卫派”主力所在地）。我记得是九月二号到的。在粮站门口，我见汽车装的人，我就问李××：这是干什么的？他说拉去杀。我又问：什么时候定的？他说在焦石最后一次常委会定的。我内心同意杀，我就没问了。（这就是前文李××交待的第二次杀人。）

六七年九月初我与周超群、王富国，通信员杨明仕，李××、陈××（杨明仕，李××、陈××三人均为赵树金的警卫员），到后勤部找看伤员，在“联司医院”（丰都包鸾学校）二兵团的何××等向我反映，俘虏不能与伤员住一块，俘虏又不老实，还在唱歌。我到医院对李××说：俘虏还在唱歌？李××说没得这回事，没有唱歌。只有两个解索，还说很不好管。我说：不听话就杀了他妈的。第二天我还问李国权杀了没有？杀的这两个我不知姓名，在哪里杀，谁杀的，我不清楚。但是我叫杀的，这一罪责我是逃不脱的。（这就是前文李××交待的第三次杀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六、七号，时间不很准。在包鸾粮站开常委会，有况道成，彭用吉、黄××、余××，黄年福，王富国，研究部队撤退（问题），（这是一个）有“红焦司”、清溪、丰都、垫江等地“红卫派”负责人的联席会。会后，王富国从右边衣包拿出要杀的人员名单交给我。他说：编了号，二号下次考虑，三号

是研究要马上杀的，请我最后定夺。我就夹到日记本里。吃了晚饭我看后，在不同意见杀的名字上打×，有疑问的打问号，同意杀的名字上就打个圈。

第二天常委继续开会，人没有到齐，我记得有况道成、彭用吉、余××、王富国、黄年福、我。我就把把杀人的名单交王富国，并说：杀那么多干啥？放了些。彭用吉反对我，说：“二七”在大东门沉水就是 200 多，大喊救命（注：这是谣传）。王富国说这放还得了？在丰都的 8042 得到消息，就跟上来了。彭用吉说，就等于给敌人放信。况道成也说坚决放不得。黄年福说要放也晚一点，我们正要撤退。我还说，其中有两个我不同意杀（一个是焦石的医生，一个是“毛主席的红卫兵”王仁达），彭用吉说：焦石红联司也不同意。我说不同意不行。于是就决定杀十八个。王富国就问我：打记号是怎么回事？我说：打问号的要重新研究，打×就是不同意，打圈就是杀的。这样大家一起决定杀十八个，我个人原先打圈决定杀的只是六个，后经大家研究我最后也同意决定杀十八个。（这就是前文李××交待的第五次杀人。）

一九六七年九月十一日罗××就来问我俘虏怎么办，我说大部份放，坏的带走，很坏的杀掉，就没有决定杀哪些，杀多少，不知彭用吉、况道成他们怎么研究的。这就是说，九月十日我亲自批的十七、十八个，记不很清楚。十一号（我又说）坏的杀掉，这两次总共杀 33 人。

以上我交待的是我亲自批杀的。由于我们这样杀人，丰都同观点的也杀，据我知道，退到栗子山，我住在栗子兴隆三队，杨明仕就对我说栗子山的造反派也把地主杀了两个。（由于我们的影响）到底那些地方杀多少，我搞不清楚，（但由于）我们退到江东后就开始杀，所以焦石、丰都也开始杀人（赵树金当时还不知道，清溪杀人更厉害）。

下面再让我们看看亲手杀死 24 人的赵树金的贴身警卫员杨明仕是怎么交待的：

第一次杀人是八月二十日晚，是从焦石出去到悦来（即现在的涪陵卷洞乡）十多里地的地方，杀 10 人，我杀了四个……晚饭后约半个小时，赵树金来寝室对我说：“小杨，今晚你和况道成一道去把那几个坏家伙枪毙了。”当时我问：杀人要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啊？赵树金回答道：“这个时候还经什么批准？我就是最高人民法院。经我批准我负责。你没听中央电台广播吗？几镇压嘛。要对苏修特务、美蒋特务、日本特务，地富反坏右、牛鬼蛇神实行三镇压。”晚上十点来钟，况道成从“联司参谋部”（焦石公社楼上）出来，提着手枪喊：“老杨，走。”我就去了。刚下楼时，况道成说：“他们不敢，我去。”

况道成把我带到焦石粮站，他叫王××把那十个坏家伙弄出来捆起。王就拿

起名单把他们个个叫出来捆上。况道成又叫王××派十几个可靠的把人押到焦石区公所门口上车。……十个人是第三批枪毙的，第一批三个，我和况道成各杀了一个，另一个是保卫科林××打的；第二批也是这样，我们三人各杀一个；第四批杀四个，我杀两个，况道成杀一个，是我们一个单位的（石油公司）叫张本祥，那一个不知是谁打的……

第二次杀人是八月二十七日丰都高镇，枪毙两个，我按赵树金的亲自命令去执行，我杀了一个……

第三次杀人是九月三日晚上，在丰都包鸾亭子垭，枪毙两个，都是我杀的，两个都是打的头部……

第四次也是在丰都包鸾亭子垭，枪毙 13 个，我杀了一个……这次我虽然没开枪，但最后那个是我先用刺刀刺倒后，我旁边的向××（“贤派”四兵团的一个营长）用手枪连发几枪打死的，由我负责。

第五次杀人是九月十一日晚上在包鸾亭子垭杀三十三人，我杀六个。当天下午我看他们在开常委会，晚饭前，242 李××、夏××（二人均是重庆后字 242 的）等人，李对我说：今晚上跟我们一块去执行任务去，要带上刺刀。当时有陈忠华，李玉祥和我（注：均为赵树金的警卫员），吃过晚饭后，我回到寝室，赵树金对我说：“小杨，你们几个今晚上和二四二李××、况道成一起去把那几十个坏家伙干掉，用刀杀。”这以前赵树金就曾对我说过：“他们每次枪毙人都用枪打，不敢用刀杀。”赵又说：“在抗日战争时，抓到汉奸，一条腿绑在树上，另一条腿用绳子绑到，一拉成了两半。这样又节约子弹。弄了就推到井里去了。”

晚上十点钟时候，由 242 文筹李××叫我和陈××、李××、242 文筹夏××、红成朱×、王××，黄年福的警卫员小周，在包鸾粮站坝子集合，李××背的苏式步枪，陈××背的半自动，其他人都带的手枪。李××跟大家讲，第一，给他们作个榜样看一看，第二，不要发生事故。我们几个先到前面去看地形。当时况道成在车门口站着等到上车，还有况道成的警卫员石××背半自动步枪。上车一直开到亭子垭，下车后，李××布置小周、夏××站在公路边上接后面的车，其他人就由李××布置叫红成王××到洞口的左侧坡上放哨，其他人就在洞口。我们全都听到洞下面有人在叫（可能是上次杀的未死），况道成就跟他答话，受害者在下面说要吃饭，要水喝。况道成又说：“我们是川丰的，我们来救你，等到起。”后来把 33 个全部杀完后，还没推下坑前，况道成就用绳子把这个人拉到洞的半中间，又放下去跌死了。

……第一车押来 17 个，一直押到洞口下面红苕土跪着，分四批杀的。……第三组杀四个，是我和况道成杀的，各杀两个，我是用陈××的半自动步枪刺刀杀的，都是剁的背部，每个人都剁了四五刀。我们杀的这组里有个十七岁的学生

呼“毛主席万岁”，连呼两声，况道成就上去把他刺死了。

第二车押上来 16 个，也是押到洞口下面红苕土跪着……第二组杀四个，我杀四个，有三个是我连续刺死的，另一个不知是谁最后刺死的……

……李××回去在宿舍里说：“今晚干得痛快。”我指着鞋上的血迹说：“像剥豆腐一样。今晚我干了六个，累的够呛。”

第六次杀人是九月十三日下午在丰都包鸾老鹰岩山脚下。杀十个人，全是我杀的。由于这次决定枪毙的 10 个人中有两个是我们本派的所谓“叛徒”，一个是曹国良，一个是王仁达（涪陵一中的学生，红卫兵），而且我听说这两个人很凶，还想夺四兵团的手枪和联司的作战地图（注：他们都是被当作“叛徒”“逃兵”抓起来的）；再加上那天我们都在忙着从丰都包鸾往栗子寨撤退。所以，我曾两次都不答应去执行这一任务。还是况道成最后下命令，并说：“怕啥，我负责。”我才决定去的。……当时王××推我打，我就提着枪一个个的将受害者带到山沟里面，跪着打的。我带的六发子弹杀了六个；另外我又借了保卫科的驳壳枪打了六发，杀了四人，其中有两发是填的枪。”

（笔者注：杨明仕后因此被判死缓。）

最后让我们看看作为“红卫派”第一负责人（名义上的，因为赵树金才是实际上的第一负责人）的况道成是怎么交待的：

我亲手用枪和刀杀的有七人。其中“八一—事件”（指 1967 年 8 月 11 日在涪陵龙潭袭击 7822 部队车队打死解放军指战员 23 人）中有个解放军负了伤没有死是我填枪打死的；8 月 20 日晚我在悦来转角处用 54 式手枪打死 2 人（即杨明仕交待的第一次杀人）；9 月 11 日晚我在亭子垭用刺刀杀了三人（即杨明仕交待的第五次杀人）；9 月 26 日退出栗子寨后在接龙寨我又用 54 式手枪打死一个抓来的人。我亲手提笔划勾批准杀的 42 人，其中 8 月 27、8 号在焦石公社楼上提笔划勾批杀 12 人；8 月 26 日四兵团有两人来说，在清溪龙驹抓了些人，要求我们批准处理，我同意批准杀 3 人；9 月 15 日在铜矿山我又批杀 17 人；9 月 24 日我同意批准杀了 10 人。我参与研究同意批准杀的 53 人，其中悦来杀 10 人，包鸾两次研究在亭子垭杀了 33 人，撤出包鸾时在老鹰山杀 10 人。

（笔者注：况道成后因此被判死缓。）

我不打算再引这些本应由官方公开的已经过去几十年的历史记录了，但我相信总有一天会在文革全面解密之后，人们会读到这些早已记录在案的血腥文字。

唯一可以告慰那些无辜而悲惨逝去的人们的，是这些肆虐者都受到了他们应该得到的惩罚：

赵树金（涪陵“红卫派”红联司在 1967 年夏秋的实际总负责人，原涪陵军分区副参谋长，1966 年 11 月转业到原涪陵地区商业局任政治部主任，13 级高干，最先决定开杀戒，并亲自批准杀 33 人）被判死缓；

况道成（“红卫派”红联司名义上的第一负责人，转业军人，原涪陵县郊区供销社文书；主持了七次研究杀人的会，亲手提笔划勾批准杀的 42 人，并亲自动手杀死 7 人，其中 3 人是他用刺刀捅死的）被判死缓；

杨明仕（赵树金的警卫员，一人杀了 24 人，其中 6 人是他用刺刀捅死的）被判死缓；

苏朝海（外号“苏赖子”，用菜刀割断八人喉管而杀死八人，清溪杀人凶手）被判死缓；

吴家治（原清溪区武装部长，指挥批准杀害 39 人）被判死缓；

冯少禹（原清溪区供销社干部，清溪“杀人班”班长，亲自指挥并直接参与杀了 33 人）被判死缓；

其他杀人者也受到了相应的制裁。

但我以为，这个历史悲剧给我们的警示我们还远没领悟。

### 不是结语的结束语

在记录完当年那些不堪回首的武斗场景，特别是写完那些涪陵文革史上最残酷最血腥的文字，发完“鲜为人知的涪陵文革大屠杀”的博文之后，沉重而悲痛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更何况因此我的天涯博客被封）；所以，当我准备再往下写时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真有点“剪不断理还乱”。

我试图按台湾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副教授关向光的论述，对涪陵大武斗做个总结，因为他曾说：关于“文革作为一场大规模的运动，在有限的一段时期（2 至 3 年）内，空前绝后地发生了集体暴力盛行的状况。根据安-诺顿的分析架构，暴力可以分为‘建制性个别暴力’、‘非建制性个别暴力’、‘建制性集体暴力’、‘非建制性集体暴力’等 4 个类型。文革的一大特征正是‘建制性集体暴力’与‘非建制性集体暴力’的同时并存与盛行。”（关向光：《文革再认识》，载《展望与探索》四卷六期，2006 年 6 月，7-12 页。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英文系教授徐贲也有类似的精辟分析，见他的《文革政治文化中的恐惧和暴力》。）

我还试图根据在国际社会心理学界与弗洛伊德齐名的勒庞（Gustave LeBon）关于“群体心理”分析的大作《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和莫斯科维奇的大作《群氓的时代》，对在当时那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原本循规蹈矩、个个都好像很理性的人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社会动物”（勒庞语）的现象作出分析，因为

他们的论述都得出了这样一个共同的结论：在人们“加入了受人民崇拜意识形态蛊惑的群体之后，就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他们就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而且他们在一种‘历史使命感’感召下，并没有任何关于犯罪的意识。”（弗洛伊德和勒庞、莫斯科维奇这两种心理学有其侧重的研究对象，前者着眼于个体心理因素与“异常行为”的关联，后二人则专注于“正常”个体聚集成群后发生的可怕的心理变态。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揭示了人类心理中存在着某些不受理性原则支配的强大因素。）

我自知自己还没有这个能力用他们的理论来深入剖析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可笑、可悲、可耻、可恶的现象，但我知道人们一定可以依据这一理论从中找到某些解释——因为我自己就曾经“加入了受人民崇拜意识形态蛊惑的群体”，并“变成了乌合之众中的一员”，曾经那样的疯狂，那样的痴迷，那样毫无理智的狂欢！

现在，当我们可以冷静下来回顾那些往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该问一问自己：我们是怎么“一下子就变成了‘社会动物’”呢？怎么就一下子“如同发生化学反应一样变成了一群疯狂和无恶不作的家伙”呢？怎么就会差不多像当年的德国人一样举国高呼“嗨——希特勒！”了呢？

我甚至想对赵树金说几句同情的话——因为“可恶的人也很可怜”——据说赵树金对他亲手批准杀人一事一直都很痛悔；虽然实话实说，对于赵树金的遭遇，我并不太同情。

我的生活经历告诉我，一般的正常的人（或者少犯错误的人）在其生活实践中都人为地为自己规定了一条底线，这条底线的标准就是最基本的人之为人的最起码的与纯动物的区别。我认为，人，作为有思维的“社会动物”而不是纯动物，除了无法防止来自外在的，强大到威胁自身生存的压力，以及因信息的不对称而产生错误判断，并做出错误的举动因而可以原谅以外，他应该是有基本的自我判断能力的；这种基本的自我判断能力的直接结果就是，他可以克制自己不去犯那种他原本已经判断是错误的错误。这种我认为正确的基本判断说起来也简单：不威胁自己的生存，就不能采取危及他人生存的行为（其实就是像我平生最害怕的动物——蛇也具有这一“正确的基本判断”）；不是靠自己问心无愧的努力应得的钱财，就绝不要伸手；不是应当得到的感情就绝不能去强迫。所以，在那个最复杂的年代里，我按照这一生活原则几乎是下意识地为自己规定了“三不”：不打人杀人；不贪财贪污（用当时的时髦语言：不犯经济上的错误）；不贪色（用当时的时髦语言：不乱搞男女关系）。我当时只是认定，坚持了这“三不”，自己就不会犯错误，不会挨整。庆幸，我也就是因为这“三不”，才在文革那样复杂的年代里虽两次身陷囹圄而全身。

也正是因为至今我仍然认为这三条是对的，所以至今我仍然不能同情赵树金的遭遇，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也就是我最无法下笔的上面那些最血腥的文字。因为从某种角度讲，赵树金原本是可以让那些最血腥的文字不出现的（他是有这个机会，也有这个威望的），而他并没有这么做。

我也想对况道成说几句谴责的话——因为“可怜的人同时也很可恶”——我的一个朋友亲口告诉我，这位主持了七次研究杀人的会，亲手提笔划勾批准杀42人，并亲手用手枪和刺刀杀了七人（其中于1967年9月10日晚作为示范带头用刺刀一连捅杀了3人）的况道成，在上世纪90年代初出狱后仍不知罪，竟然要当时的涪陵市委组织部落实政策。（我的一位已年过七十的朋友周××，退休前为原涪陵某校校长、书记，与况道成同学、初中毕业后同时参军入伍；当况道成1966年4月以某炮团排长身份转业时，周仍在炮团，已是连长。大约是1995年，况道成刑满出狱回涪陵，周也转业多年，时任涪陵某校校长、书记。一个偶然的机会，战友相会，况道成当着他的这位知根知底的战友却明确的表示，他被错整了，他正要去当时的涪陵市委组织部落实政策。结果当然未能如愿。况后去成都安家。）

其实，这里完全不存在派性不派性的问题，就是对所谓胜利者的“忠实派”来说，但凡有杀人问题或与杀人问题有牵连的，都一样在接下来的时日里受到清查，并受到惩罚而影响其之后的命运，这方面的情况容我后说。

可叹的是，还有不少不明真相的人——甚至是当年的当事人——还在坚持那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无所谓态度，甚至坚持那种对历史极不负责任的话语，这就不能不令人深省。

这里，我又要提到“逍遥词客”，看看他是怎样看待赵树金等人的杀人罪行的。在他其中的一首诗（见“中华诗词论坛”）里，专写了1967年9月10日况道成等用刺刀杀害33人的行刑处包鸾亭子垭，他是这样写的：

#### 涪陵地区文革四十周年祭（组诗）之十二 亭子垭

亭子坑中尸，至今仍有疑。\*  
贸派当时败，难免有情绪。  
可怜金志勇，转业便刑拘。\*\*  
后虽得释放，黯然去扫地。

原注：

\*当时宣传的是贸匪的杀人坑，后来一般认为此事不假，那是贸派保卫部门



所为。但一般认为没有那么多，怀疑砸派移了一些武斗中死亡的人在内；另一方面两派的人都有，那是文革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后来也没有人为此而获罪。

**\*\*金志勇**，曾当过毛泽东的警卫员，文革前由中央警卫团转业，文革时期在贸派中负责保卫部。贸派失败后被拘捕，后来落实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时被释放，但未恢复工作，只作了一名清洁工终其一生。

“逍遥词客”虽然客观地承认“后来一般认为此事不假”；但却说“那是贸派保卫部门所为”，而且还用无所谓口气说“贸派当时败，难免有情绪”，更说“后来也没有人为此而获罪”，这就完全不顾事实了：赵树金、况道成明明是“红贸派”的一、二号人物，一个亲手批准杀了33人，一个亲手批准杀42人，怎么成了“那是贸派保卫部门所为”？何况说难道“有情绪”就可以杀人？赵树金、况道成二人均被判死刑缓期执行后改为有期徒刑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出狱，怎么能说“后来也没有人为此而获罪”？

此外，“金志勇”应为靳志勇，据他自己交代，他用手枪杀了12人，并因此被判20年有期徒刑（后减刑）；靳志勇也不是“文革时期在贸派中负责保卫部”，而是“红贸派”保卫科（专门负责关押审讯处理抓来的“俘虏”等的机构，负责人是红联司的一个常委和“红贸军总部”的李××）下设的保卫组的成员。同时，他自己在交代中也只是讲，“1950年3月至5月给林彪当了两个月警卫员，后给谭震林当了两个月警卫员。”也就是中央领导人的一般警卫战士，并没有给毛泽东当过警卫员；而且靳志勇也是文革后刑满出狱，而不是“后来落实中央解决四川问题的‘12·25’批示时被释放”的——这是到涪陵海陵厂一问便知的事。

著名当代作家冯骥才先生在他的文革纪实《一百个人的十年》一书的序言中说：“一个没有忏悔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纯洁的人生从忏悔开始，丑恶的人生自负疚结束。”

他还说：

“尽管灾难已经过去，谁对这些无辜的受难者负责？无论活人还是死者，对他们最好的偿还方式，莫过于深究这场灾难根由，铲除培植灾难的土壤。一代人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理应换取不再重蹈覆辙的真正保证。这保证首先来自透彻的认识。不管时代曾经陷入怎样的荒唐狂乱，一旦清醒就是向前跨了一大步。每一代人都为下一代活着，也为下一代死。如果后世之人因此警醒，永远再不重复我们这一代人的苦难，我们虽然大不幸也是活得最有价值的一代。

“.....

“终结文革的方式，唯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

---

## 【编读往来】

### 张光渝谈 59 期两文

看了科学院的文革纪事，一个知识分子成堆、领导干部相对开明的单位，也被折腾成这样，能够体会出当年的领导干部是如何彷徨无奈，科学工作者们是怎样精心判断风向，在保与反中赌博般选择的尴尬。反总理的变成悼念总理的，右的变成极左的，而文革一结束，却发现十年时光全是在做一场无聊的游戏。如果现在谁还在宣扬自己文革中立场坚定正确，大义凛然地维护自己派别的所谓“革命性”，就应当看一看这类文革纪事，试试能不能找出“一贯正确”的所谓“革命派”来。

这类文章似应以客观记录和叙述为本，少些或不必做出有倾向性、结论性的评论。比如对胡耀邦在科学院急于求成的评论，就是作者一家之言，与全文的体例不统一。

59 期关于华国锋是否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一文，觉得结论太勉强了。毛给了华国锋“第一副主席”的前所未有的头衔，难道不是指定接班人？非得像“九大”党章一样写明白？毛还能那么干吗？有没有“你办事，我放心”，如何解释这六个字，主要是用于当时的政治斗争，但不能否定毛确定华国锋接班。

### 李正权谈 59 期张光渝文

59 期《梦断乌托邦——读几本文革造反派回忆录》，选择的是几个当年“名人”的回忆录，他们在回忆时都不忏悔，甚至为自己评功摆好。作者对这个问题分析得不错。但是，也有造反派在反思，在忏悔的，可能作者阅读范围有限，没看到吧？因此，该文便显得不太全面，这样就使分析也有不到位之处。

当今写文革回忆录的，不管是文革时的造反派还是当权派，普遍有推卸责任、只说自己受害不说自己作恶的倾向，让人感到那时候好像都只有受害者，而没有作恶者。林彪集团一些人及其后人的文章，以及戚本禹写江青的文章，都是这样。我认为，任何人都不能在客观反映真实时回避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否则就无法让后人相信：文革怎么能搞起来，怎么能做出那么多坏事？

### 辛巴德谈华国锋是否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

通常而言，接班人问题是专制政体最大的迷思之一。对此展开探讨，一是必要的，二是艰巨的。作者认为华不一定是毛确定的接班人选，有一定道理。但囿于定见，思维不够开阔，有若干缺陷。

据历朝历代成例，如果未立“太子”，传位这样的根本大事，“遗诏”才有效力。而毛恰恰没有留下这样一件法宝（即文中所说的“书面文件”）。因此，“太后”表态显得格外重要。故江、华关系才是玄机所在。不过，毛把邓小平打下去后，提名华为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文中未提此点）。至少从字面上看，华具有其他任何人所不及的合法性。

该文提出一个论断并举例证明：社会主义国家的党魁和政府首脑通常是两个人，并以注释方式补充道：斯大林和赫鲁晓夫是例外。“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苏联的做法合适与否，是一件事。接班困境与中国有相似之处，是另一件事。事实上，斯大林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与华国锋相当类似。而决定这一切的因素在于：像斯、毛这样的雄猜之主，注定无法选出最终的接班人。最后结果，只能是形成各种对立势力并存的过渡班子；只能是：“我死之后，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其实，作者忽略了一件事：华的“弱势”，恰恰是毛选择他的理由。强势如邓，早晚起冲突。强后配弱君，才有吕后、武后、西太后等的临朝称制。另外，肯定江、张的政务“能力”，似有不妥，因尚未形成公论，容易引起争议（不带偏见，需要佐证）。至于“江青在政治上的坚定性也是华国锋所望尘莫及的”，这个“政治上的坚定性”更是比较虚幻，不提也罢。

## 黄顺义征集三位武斗死难同学照片

1967～1968年文革武斗中，重庆大学死亡了27名同学（可能是大学生武斗中死亡人数最多的一个高校）。为纪念这些死难的同学，我多年来一直在收集他们的资料，已经收集到了其中24位同学的照片，还缺3位的照片，他们是：

冶金系钢压专业70级1班陈蕴健、吴中和；

机械系70级杨兴格。

他们都是1967年8月18日在重庆市九龙坡区王家大山罹难的。殷切希望存有这几位同学生前照片的朋友，无论是集体照或单人照，均能提供出来，请与黄顺义联系，电话：（023）68864351。